

SHENZHEN LAWYERS



深圳律师

非常视线 专业见解

对话与合作——2014中国公司法务年会

年会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法律服务市场新变革为契机，探讨我国优势行业企业在面临企业转型升级压力时，法务部门如何通过主动调整、提高、完善以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构建公司法务和外部律师“对话与合作”的平台。

“锁定房源”法律分析

佳兆业若崩盘 业主该如何自救

深圳律师助推个人破产条例率先试行



NO. 55

2014年第6期 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办
法人杂志社协办

法人
FAREN MAGAZINE



®

律师之家

律师之家是面向律师个人提供的专业的手机应用APP。

深圳律协会员（律师和实习人员）可以直接通过深圳律师网的账号密码登录使用。

扫描右侧二维码，可直接安装。



安装律师之家



目前主要功能有：

法律圈热点文章

OpenLaw 裁判文书检索

法律法规库

律师计算器

协会应用平台

未来，深圳律协将会在“律师之家”平台上定制更多适用于深圳律师的特色功能，敬请期待。

如果您对“律师之家”平台有任何需求或意见，欢迎大家提出，我们会及时反馈和处理。

深圳市律师协会

联系电话：（0755）8302-5800

电子邮箱：xzb@szlawyers.com

<http://www.szlawyers.com/>

专注于法律行业信息化，因为专注，才能更专业。
我们更需要您的支持和鼓励，推动法律行业大数据应用。



关注律师之家公众号

内外部律师深度融合成为新常态

文 法制日报社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秘书长 肖黎明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盘点2014年，“依法治国”必然是中国最强音。而盘点中国公司法务界这一年，也有两件盛事，一是2014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华南会场首次在深圳举行。这是法制日报社整合资源成立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之后，首次与深圳市律师协会的牵手。二是双方继续携手，于2015年1月10日至11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一起主办了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北京会场。

这两场会议高端、专业，确实是两场思想的盛宴。

在华南会场，与会嘉宾深入探讨了内部法务与外部律师的角色定位、作用发挥、合作共赢等话题。在北京会场，与会嘉宾则分别从内部法务和外部律师的不同视角，探讨了如何把控“一路一带”上的法律风险，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及混合制的推进等热点话题。

近几年来，公司法务越来越成为业内关注的热点，而且正成为公司管理的热点话题。

这一方面与我们国家加快法治进程有关，依法治企正在逐步融入企业血液。法治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摸不见、却感受得到的软实力，正成为企业共识，不少企业正在将打造法治软实力贯穿于企业管理之中。

在国家层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建设高效的法律实施体系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保证宪法法律严格实施。”

立法的完善、执法的严格、司法的规范，必将对企业提出更高的挑战。以前企业可以通过找关系、内部协调等手段应对面临的问题，但今后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依法解决问题，依法治企日益成为新常态。而这也意味着，内部法务和外部律师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随着企业改革进程加快，企业“走出去”与跨国公司同台竞技，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也将成为新常态。

内部法务虽然上个世纪50年代即产生，但在企业呈蔚然之势源于我国应对入世的挑战。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从国有企业开始，建机构、搭体系，从几千人发展到两万人的内部法务队伍，一步一步走来充满艰辛。

近年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很容易因为不熟悉东道国法律、风俗习惯等或者盲目照搬国内做法，而产生劳工、环境、投资等各种风险。虽然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将法律风险防范的触角延伸至国外，但是法务力量远远不够。内部法务必须与外部律师深度融合，方能共同抵御风险，保障投资安全。

新的一年，我们期待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与深圳市律师协会继续凝心聚力，从会内到会外，共同研究行业的重大课题，深入合作，搭建内部法务与外部律师融合的平台，助力美丽的“法治中国梦”早日实现！



法人

主办：深圳市律师协会
协办：法人杂志

粤内登字B11277号



本刊随《法人》杂志赠阅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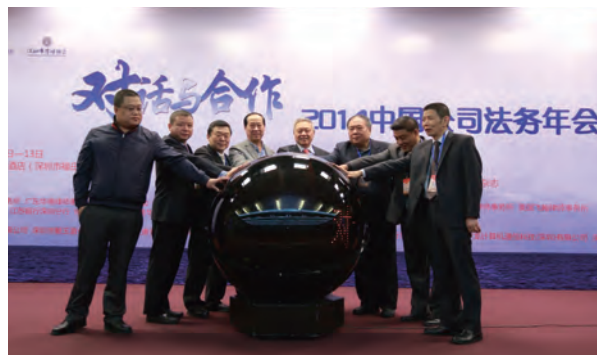
编委会 主任 高 树
编委会 成员 张 斌 黄思周 韩 俊
胡宁可 张 鹏 张 弢
主编 张 斌
执行主编 王 红 张 鹏
栏目编辑 周争锋 俞 飞 陈 伟
杨新发 舒 笑
编辑 陈 夏 王 颖
美编 刘晓莹 赵 佳 周洪磊
电话 0755-83025728 83025789
传真 0755-83025177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
时代金融中心20楼
邮政编码 518048
电子信箱 shenzhenlawyers@163.com

视线 VIEW

P4-P5

- ◎ 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
监管有力而不是信息公开
- ◎ 深圳“车位立法”违法论是个伪命题
- ◎ 严惩性侵幼女者 应从司法做起
- ◎ 老父告女与“常回家看看”

热点 HOTSPOT



专题：对话与合作
——2014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华南）

P6 法制日报社社长雷晓路在年会上的致辞

P7 市政协副主席在年会上的致辞

P8 四中全会后法律服务新变革

P11 转型时代律师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P12 构建和谐法务团队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P14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律师业务

P15 前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思考

P16 知识产权纠纷中的攻击和防守

论道 DISCOVERY

P23 “锁定房源” 法律性质分析

P24 佳兆业若崩盘 业主该如何自救

P26 新环境保护法热议

实务 PRACTICE

P29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 大有可为

P32 司法执行中迟延履行期间利息计算标准
四大转变分析

拍案 CASE AND EXAMPLES

P35 埋线减肥埋下祸害 依法诉讼讨回公道

P36 在商品交易文书上使用他人商标的定性

P38 商标侵权案中承担责任的主体

人物 PROFILE

P39 深圳律师助推个人破产条例率先试行

生活 LIFE

P42 在社区里奏响法律人生的交响曲
——8年“法律进社区” 打造
品牌社区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P44 “创一流” 让深圳律师走得更远



资讯 INFORMATION

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监管有力而不是信息公开

2014年12月中旬，国务院以国发〔2014〕61号文下发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定了鼓励和规范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

（综合媒体报道）

《意见》围绕扶贫济困、衔接社会救助工作确立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明确突出了扶贫济困、坚持改革创新、确保公开透明、强化规范管理等慈善机构的活动原则。针对监管工作薄弱的现状，《意见》提出构建由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慈善事业综合监管体系。《意见》中重点强调的慈善活动公开透明，被认为是保障我国慈善活动健康发展的一剂良方。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及“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系列不良事件的曝光，引起了社会公众对我国慈善组织的广泛关注。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慈善组织信息不公开是导致国内慈善组织陷入信任危机的主要根源。国务院的《意见》要求慈善活动公开透明，似乎是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不然，慈善机构作为非营利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政府不得规定其必须的信息公开义务，正像不上市的企业没有信息公开的义务一样。政府信息公开是因为政府是花的纳税人的钱。其他社会组织的信息若要求公开，必须是有条件的。上市公司信息要求公开是因为你上市了，要对广大股民股东负责。非营利慈善机构信息公开通常以免税作为条件。在美国一个公益组织如果申请免税资格，联邦税务局会给出一大堆表格要求填写，所填写的信息全部上网，也就是全部信息公开。如果不申请免税，只要公布年报就可以了。有国内专家认为，慈善组织的公开义务应移到政府相关部门那里。政府应尽到对慈善机构的监管责任，而不是发一纸要求慈善活动公开透明的指示了事。这样的话，也不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看来，政府的管理应该变换思维，不能总是要求别人承担义务，而应勇于自身承担责任。

（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 刘砾律师）

深圳“车位立法”违法论是个伪命题

近日，深圳市律师协会就《深圳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停车位建设及处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办法》）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圳多家媒体到场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

研讨会上部分代表房产商的律师认为《办法》缺乏上位法基础，笔者不这样认为，原因如下：

一是房产商律师认为《办法》违反了《物权法》第74条第2款规定，认为该款已明确界定了住宅小区内停车位的归属问题，即归开发商所有，该条款原文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是约定取得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只是针对建设单位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处分给业主是否符合“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予以明确，只涉及车位使用权而不涉及所有权；第6条只是认定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增设的车位为物权法第74条第3款所称的业主共有车位，并不涉及该增设车位之外车位的权属问题。

二是房产商律师认为车位所有权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根据《立法法》规定只有法律才可以界定、限制或者剥夺，《办法》规定配建车位属于全体业主所有是以红头文件形式否定法律规定。实际是《办法》并未规定配建车位属于全体业主，而是规定“配建停车位应约定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全体业主共有，增设停车位可约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有”（见第4条），完全遵循了《物权法》权属约定制规定。

三是《办法》第4条在表述方面确有不妥，应修改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出让给同意配建停车位归全体业主共有的受让人”，但绝非违法，因为任何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缔约条件，政府附条件出让土地是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是《物权法》所赋予的权利之一，如果受让方不能接受所附条件可以不交易，由同意接受条件的受让方受让，如果没有任何人同意条件导致的结果无非是交易不成土地流拍而已，政府并没有强制受让方接受条件受让。

（法向人间）

严惩性侵幼女者 应从司法做起

最近，许多媒体在屡屡曝光幼女受到性侵害的案子的同时，也对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的罪名产生质疑，认为该罪名已成了性侵幼女者逃脱严惩、肆意妄为的救命符，应当废除，并以“强奸幼女罪”严处。

（综合媒体报道）

诚然，对性侵幼女的犯罪分子应加以严惩，但是否真的有必要将性侵幼女现象多发的原因归结为立法上的不严厉？“嫖客”们在实施性侵幼女时真的考虑过相关法律后果？显然未必。其实，在法治发展的过程中，“严惩”的观念是需要慎重对待的。在笔者看来，对犯罪加以重罚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和朴素的法治观念——复仇观念的反映。这种观念在建立完整的刑罚体系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法治文明发展的过程已慢慢远离复仇形态，酷刑不断得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普遍的规则实现公平。

当然，法治文明发展的过程肯定不能弃人们的认识而不顾，反之，应当与人们的观念相适应。毕竟，法治要得到人们的信仰才有权威，首先要得到人们的认可，若对性侵幼女行为没有相应的惩罚，刑法显然就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那么，我们的法律对性侵幼女的犯罪惩处力度是否过轻了呢？显然不是。嫖宿幼女罪和强奸幼女罪两者的立法原意本都体现了对强化幼女的特别保护。但由于强奸与嫖宿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故意，因此，又不能混为一谈。取消嫖宿幼女罪说并非恰当。事实上，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公职人员性侵幼女的行为往往都被认定为嫖宿幼女罪的现象，更多的由于司法部门对公职人员的偏袒和枉法裁判的结果。这的确可能纵容了性侵幼女的犯罪，也造成了人们对嫖宿幼女罪的误解。但因此要求取消嫖宿幼女罪也属矫枉过正。

法治的实现，不仅要有普遍的规则，更要求公平地将普遍的规则适用于具体的个案。这个过程是需要通过司法来实现的。具体说，司法部门在审理性侵幼女案件，特别是针对公职人员性侵幼女的案件时，既要严格把握好保护幼女的刑事政策，又要准确适用刑罚，真正做到不枉不纵，公平对待，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法治广东网 法治评论员 夏正林）

老父告女与“常回家看看”

76岁的郭老汉近日将三个女儿告到通州法院，称自己身患重病，要求女儿每人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据称，老人其实退休工资较高，并不缺钱，也没啥病，打官司只是因生活孤独，想借机跟女儿们见见面，说说话。经法院调解，最终三个女儿承诺以后常回家看看老父亲。

（综合媒体报道）

打自“常回家看看”入法伊始，就招徕诸多争议。争议聚焦于道德问题是否该入法，以及子女“常回家看看”往往不具备现实条件。然而，从近期一些判例看来，“常回家看看”入法仍是很有必要的，也取得了不少成效。现实中，不少子女回家之路受阻的原因尽管各式各样，但是不少是出于“不想回”，而不是“不能回”，这也恰恰是不少老人家使用法律武器的缘由。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怕儿女再不孝顺，真正要与儿女对簿公堂的老人家毕竟是极少的。而且在“家丑不外扬”的语境里，老人家即使寻求法律途径，顶多是想“告诫”子女，实属无奈之举。有人质疑“常回家看看”的可操作性，其实检验该法律条款是否科学合理标准不在于多少老人将不常回家的儿女告上法庭，而是完善后的《老人法》是否真能唤醒儿女的孝道，让更多的老人家能享受天伦之乐。

古代用“孝”等道德范畴来引导人们实施道德行为，用社会舆论来谴责“不孝”的不道德行为，这是一个道德教化的过程。法律因为无法触及人的情感世界、无法深入家庭关系内部，因而对家庭关系调整的作用非常有限。家庭和谐关系的建立，应主要依靠伦理道德规范的完善，辅之以社会舆论人性化的正向引导与道德教化，同时需要借助法律手段推进和保障。道德教化的过程是法律无法替代的。因此，法律手段并非引导孝道的最有效手段，不宜放大与依赖。

尽管道德的问题终究需要用道德行为来解决，但是法律对道德行为的引导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老年法属于社会类立法，因此具体细节不可能规定得很清楚。但我们也看到新修订的《老人法》在一些法律条款上面仍需不断细化，方有利于“常回家看看”落到实处。

（广东法治网 法治评论员 谢文鑫）

HOTSPOTS | 热点——对话与合作——2014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华南）

法制日报社社长雷晓路在年会上的致辞

文 法制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雷晓路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光临！

由法制日报社、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和深圳律师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华南会场，从实时被雾霾困扰的北京来到天清气爽的深圳，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尤其是空气。但是一切又是熟悉的，因为这儿有我们的许多老朋友，每年年底我都会充满期待，期待着不是过年，而是每年一度的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因为年会上不仅可以见到老朋友，还可以结识新朋友，在此，我要衷心感谢诸位老朋友长期以来对中国公司法务年会的鼎力支持，同时欢迎诸多新朋友入列年会。借此机会还要感谢程科伟主席、丘征副司长拨冗莅临我们的年会，感谢深圳律协和我们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的同仁们前期为筹备论坛所付出的辛劳。

今年的年会有两场，一是今天举办的华南会场，另一个是明年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华彬国际大酒店举行的北京会场，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朋友继续支持参与我们的北京年会。今年是公司法务年会举办的第四个年头，适逢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今年召开，把两个会场分别设在北京和深圳意味深长，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个代表锐意进取，一个代表稳中求进，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首先我对今年年会的流程与看点做一下预报。本次深圳年会将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精神深入探讨全会后法律服务市场改革发展，内外部律师合作共赢，移动互联网时代法律服务创新等话题。同时，

全国首份反商业贿赂白皮书将在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北京会场上独家发布，我们也期待诸位同仁共同关注。本次深圳年会的主题是“对话与合作”，来参加我们年会的都是充满理想、热情，愿意为中国的法制建设精心注力的人，我们都是朋友，朋友之间需要对话，朋友之间需要合作，中国公司法务年会从创办之初一直致力于律师之间的对话合作，内部律师和外部律师是朋友，深圳与北京也是朋友，朋友因为对话而彼此交心，因为合作更加紧密。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能够更加务实、深入，内外部律师之间的交流能够更加密切、融洽。

最后我想说的是，法律不是闭门造车的专业，我寄望借助中国公司法务年会这一平台，通过一天半的充分对话，各位朋友能够充分深入的交流，畅所欲言的表达，求真务实的探讨，让我们乘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东风，共同为法务事业的变革、创新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卓见。



相关阅读

年会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法律服务市场新变革为契机，探讨我国优势行业企业在面临企业转型升级压力时，法务部门如何通过主动调整、提高、完善以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构建公司法务和外部律师“对话与合作”的平台。

除延续了往年年会高端、专业的特色以外，年会还体现了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首次联合律师协会举办，充分体现了法制日报社作为另一主办方对深圳市律师协会的信任；二是首次落地华南区域，借助深圳经济特区优势，为企业内外部律师搭建了对话与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合作与共赢，为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奠定基础；三是首次以市场化运营方式，打破了固有的经费支持模式，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办会，办会能力得到进一步锻炼和提升，有力推动深圳市律师协会向创建5A行业组织迈进。

市政协副主席程科伟在年会上的致辞

文 深圳市政协副主席 程科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同志们，大家上午好！

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在大家共同期待和支持下，2014年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华南）会场今年在这里开幕了，这也是深圳创建一流法治城市一件大喜事。在此，我代表深圳市法律界、市政协向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法制建设上给予的关怀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大会由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和深圳市律师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大会的主题是“对话与合作”。这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律界的一次盛会。大会邀请了大型央企、知名跨国公司以及深圳本土知名企业的法律负责人、律师代表与专家学者参加，大家聚集一堂，碰撞思想、分享经验。这必将推动企业法制精神进一步提高，推进法制水平的提高，提高律师法律服务水平，推进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设水平。在此，我真诚地希望各位法律工作者在年会中能够畅所欲言，贡献智慧，碰撞思想，为深圳的法治建设建言献策，尤其是希望能够通过本次会议的讨论和探究，借这次会议的东风，进一步的加强对深圳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关注和思考。助力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设，不断为全国、全省法治建设提供新的更多的宝贵经验。

律师在构建法治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功能，是保证和促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深圳律师向来敢为天下先，富有创新精神，又不乏实干精神，在全国行业中处于领先

的地位。特别是在新一届律协班子领导下，他们坚持办实事，求突破，重服务，谋发展的工作理念，发扬团结、创新、务实、清明的作风，紧紧围绕深圳三化一平台建设的大局，以改革为抓手，促进律师服务业市场化、国际化建设，积极开展创一流的活动，全面促进律师行业发展；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天举办这样一个盛会就再一次证明了深圳律协的能力和魄力。律师要为构建法律社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必须认真做好规范和拓展这篇大文章。要进一步规范律师的职业行为，规范律师管理行为，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用正确的法制理念执业，坚持对法律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职业操守负责，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法律的公平正义，进一步拓展律师的服务领域；要把握好律师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把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穿于律师工作的全过程，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相关阅读

为期一天半的论坛分别设置主会场及两个分会场。主会场就“四中全会后法律服务市场新变革”、“转型时期律师行业的机遇和挑战”、“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能转变及作用”、“民企法务建设的经验”、“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立法新动向”、“粤港澳法律服务市场融合中的机遇”以及“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预警与防范管理”、前海视角下的金融、法律创新分别展开主题演讲及主题讨论。两个分会场就“内部法务与外聘律师的合作共赢”、“移动互联网时代与法律服务创新”、“商事争议解决的变化及创新”和“海外投资及企业并购的法律问题”开展主题讨论。

本次年会是一场智慧交融的思想盛宴，搭建了企业法务和外部律师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共同探讨和展望了律师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扩大了外部律师视野，加强了企业法务和外部律师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双方携手走向国际化。

【发言摘选一】

四中全会后法律服务新变革

文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 高树



这是一个社会治理深度转型、法治兴起的大时代，四中全会为此厘清了战略布局和目标方向。对于中国法律服务和中国律师行业来说，或许我们对于法治春天的来临和行业的发展充满了憧憬，然而从现状到愿望之间还是充满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变革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或者凭借政治纲领一蹴而就的过程，其间必然需要经历制度贯彻、战略落地、结构调整、措施整合，从不适应到适应、从适应到主动推进等等这样一些方面。我们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在变革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单向思维，如果能把我们需要什么放在社会需要什么这个范畴内进行思考，我想这既是对变革较为客观理性的分析，也应该是前行的动力和努力的方向。

四中全会对于法律服务的影响

评估一个纲领性政治文件对于一个行业的影响不仅限于文件所作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安排，尽管这样一些措施安排特别重要，然而政治文件所确立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方向才是关键，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今后法律服务的变革有着长远的、深刻的乃至十分现实的影响。

首先，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体系将全面提升作为法律服务主体的律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法律不是律师的谋生工具，法律的目的不在于保障律师的工作，律师存在的目的，在于支持社会对法律的需要，社会对法律的需要程度决定了律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四中全会关于建立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体系，对于社会治理全面转向法律需求的治国之策，不仅表明法治将全面推行，也标志着法律服务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律师在国家和社会治

理体系中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将呈逐步提升之势。

其次，保证公正司法的司法体制改革将有效地推动律师专业化和律师职业伦理逐步走向成熟。以保证公正司法为目标的司法体制改革与律师行业的发展和律师职业伦理取向有直接的关系，有助于推动律师朝专业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律师作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有助于推动律师行业的制度和结构性改革。中国律师职业化改革发端于前，但其功能因司法体制改革滞后而呈弱化。改革应该是相向和互动的，四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将对律师行业的深化改革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再次，新型律师队伍建设将迎来新的格局。四中全会将法律服务队伍中的律师作为法治工作队伍纳入，并就思想政治建设、律师分类、执业保障、律所管理、律协自律、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要求。结合全会决定关于从律师中招录立法和司法工作者的制度安排，我国律师行业的队伍建设将呈现出有序发展、分类管理和合理流动、制度保障这样一个基本格局。这是我国前30年律师行业一直未能全面解决的律师发展战略问题。沿着这样一个战略思想进行律师行业的改革和布局，我国律师行业的队伍结构和治理体系将发生深刻变化。

四中全会后法律服务基本走势

——法律服务将面临增量和保质的需求，公共法律服务和传统基础业务将成为法律服务的热点和亮点。法律服务向政府和社会全覆盖，特别是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和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推广，一些社会敏感事务，如政府采购、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重大合同和重大项目引进等都将引进律师参与机制。这无疑直接为律师行业带来较大面积的业务增量，当然这一增量还不能用具体的律师创收数据来衡量。律师创收几年内不会因此有很大变化，这期间的政治效应大于经济效应。经济创收的增长还需要有一个对应的信任酝酿期和社会适应期，律师行业对此应保持耐心和克制。同时由于社会对律师需求的扩大，社会效果认同和同业比较将逐步显现，也就是需求量越大，保质要求越高，受聘律师的专业技能、办案经验、职业操守都将成为新一轮律师同业竞争的重要选项。

公益法律服务专业化，公益法律服务逐渐向公共法律

► 我国律师走向国际，成为真正在国际舞台上
有话语权的一员，路虽遥远，但不得不布局于
目前而行之于当下，相信这将成为我国律
师业接下来要展开的重要工作。

服务转型，是接下来法律服务的一个热点和趋势，政府、律师、社会和民众需求三位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将逐步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将推陈出越来越多的产品模型，逐步取代原有的公益法律服务方式。另一方面，传统基础业务尤其是民商事案件的代理量将逐年递增。目前全国每年法院受理案件约1700万宗，但律师代理只有255万宗。律师案件代理比例明显偏低，不符合司法公平公正的要求，这一块也是律师行业增量争取的主要方面。

目前我国26万律师，律师总创收约80亿美元，只有全国GDP（2013年为8.3万亿美元）的千分之一；美国的律师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深圳一年的GDP总数，占其全国GDP（2013年为15.83万亿美元）的1.2%。我们的律师收入占GDP的比例只是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以下。单从创收的角度看，律师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但由于受制于需求量的增长不能严格以创收衡量，加上律师业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业态分流、低价竞争、税收不适应等因素制约，我国律师创收在近年内不会有跨幅度增长，甚至有可能呈现徘徊状态。

——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和分化态势明显。我国法律服务是一个区域严重不平衡的市场，仅北上广深四地从业律师就约6万人，占全国律师从业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创收几近全国的一半。一些欠发达地区律师匮乏，法律服务资源严重不足。在律师行业，大所与小所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全国性大所年收入从数亿到数十亿，而一些小所、个人所年收入几十万甚至几万元，有的大所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而有的小所入不敷出、经营惨淡。法律服务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法律服务多元化的格局造成标准不统一甚至局部混乱，村镇法律服务所、司法所，还有人数众多的其他非持牌从业人员，造成法律服务分化呈常态化。这些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估计一时难以化解，即便导入政策性因素，市场规律仍是主要方面。未来发展态势，律师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一定是大的方向，不沿着这“四化”方向走的律所将很难发展，而诚信律师、专业律师将成为律师行业的引领主流。

——我国律师参与国际竞争拉开序幕。我国经济走向世界，入世关于法律服务对外国开放的承诺，决定我国律师必须也已经参与国际竞争。如果说我国经济在走出去过程中因为不了解国际规则带来很多教训，那么我国律师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一席之地就将成为越来越危险的事。发达国家大都有一批谙熟国际规则、为其经济保驾护航并延揽国

际创收的律师群，而我国目前这方面的人才严重短缺，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纠纷中不得不聘请他国律师，实体利益和经济安全严重受损。四中全会提出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服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强化涉外法律服务，此举既高瞻远瞩，又切中要害。我国律师走向国际，成为真正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一员，路虽遥远，但不得不布局于目前而行之于当下，相信这将成为我国律师业接下来要展开的重要工作。

——我国律师行业的管理体制面临转型。目前律师行业实行的是“两结合”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前30年为律师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但从《律师法》规定的精神来看，律师协会除了行业自律，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引领行业发展。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律师行业的指导和监督机关，其历史和现实作用不容否定，特别是律师业发展过程中其行政资源相对匮乏和行业协会需要完善的情况之下，司法行政机关就仍显重要。但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决定了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和监督的内容和方式必须有所改变，律师协会的自律内涵和治理结构也面临深化和改革。

应对新变革的若干建议

在依法治国的大方向下，为了适应新的变革，我国法制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全国律师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战略决定方向，战略决定成败。面对新变革，律师行业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将起到确立目标、引领方向、选择路径、安排措施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以四中全会描绘的法治图绘为蓝本，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根据我国30年来法律服务基本体系和律师行业发展情势，有必要启动全国律师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调研和编写工作，至少尽快安排出台我国律师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二是修改律师法。律师法是关于我国律师业运行的专门法律。四中全会决定的一些重要制度安排需要通过修订补充的方式在律师法中体现，比如律师分类和律师流动机制等。除此之外，对于律师行业定位和律师专业分类管理、公共法律服务、涉外律师以及与境外律师联营、对外开放的承诺与规定、非律师从事法律业务、律师收费、律所类型、律师管理体制、律师执业条件保证等等，都应在新修订的律师法律予以更加明确的规定。

三是出台分类律师管理制度，实现三类律师的共存与合作。在律师法还没正式修订之前，对于社会执业律师、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如何统一管理、建立什么样的流动机制，应进行充分的调查论证，既要充分征求三类律师的意见、司法行政和律师协会的意见，也要听取来自社会民众、政府和公司企业的合理建议。个人认为，

作为律师行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应该从法治大局、合作而非壁垒分割的角度，进行组织和管理。

四是释放法律服务的培育和酝酿空间，解决职业精英化和法律服务标准化、网络化、大众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任何领域都需要培育和酝酿，法律服务也不例外。我国法律服务还很成熟，从量到质都需要一个相应的成熟周期。在这个阶段，任何大的政策性失误或者行业集体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极有可能导致体系的混乱，造成根基的脆弱。因此，作为行业人士，与其急切期望收到回报，不如先对法律服务释放充分的耐心和足够的善意。

律师职业精英化与服务标准化、网络化、大众化之间存在矛盾，从发达国家律师业发展的迹象看，标准化、网络化、大众化有可能带来法律服务的增量。从长远看，也可能逐步弱化增量，甚至减产，但因其具备高端创新业务作为强大前端，市场容量尚呈维持之状。在传统基础业务走向标准化、网络化和大众化的趋势之下，应充分重视高端创新业务和国际法律业务的开发和扩容，不但要做优，还要做强和做大。

五是着力加强律师社会责任体系、专业体系、诚信体系三大体系建设，解决高端法律人才的培养引进、以及律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三大体系建设关系到我国律师业稳健和可持续发展，也是法治对于律师行业的基本要求。三大体系建设既需要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也需要以诚信律师、专业律师作为主流倡导，涉及高端法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目前律师界前一代和新生代面临衔接困难，给律师业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

六是建立法律支持体系和政策扶持，解决税收难题。通过法律和政策扶持律师业发展，这是许多国家通常的做法，我国律师业的发展也有这个要求。我们注意到，除了许多法律法规给予律师执业条件和相应改善，许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相关的律师业扶持政策，但效果不太一样，一方面是市场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政策的针对性是不是很强，政策最终能不能落地的问题。

目前全国各地律师行业查账征收的政策无疑对律师业有着切实的影响，问题出在税法、征收机关、律师行业对同一问题理解有所不同，在严格遵守税法的前提下，研究出台更符合律师行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征管模式，应尽快进入议程。

七是缩小国际差距，融入国际化竞争。我国律师业与发达国家律师行业的差距比较明显，缩小差距的途径，首先，借鉴其先进的制度理念和管理模式；其次，根据自身特点全面提升专业化水平和行业诚信度；最后，建设一支高端的涉外法律专业队伍，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律所。



相关链接

法治，为社会注入安定之力。自身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和落实，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需求。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人民群众希望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盼望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得到尊重，公权与私权在各自的法定范围内行使。从全会决定具体的措施可以看到，党和国家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的坚定决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将会进一步增强，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将更加畅通。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程雷

把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提高很高的位置，是为了最大程度实现社会公正，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比如提出‘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将使政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都得到极大扩大。这是以法治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具体体现，也是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直面重大矛盾和问题作出的重要决策。推进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将为社会法治的实现创造一个基本条件，避免法律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每个人得到的法律服务更加充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

使百姓参与可以更加深化和细化，这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立法中，可以让其过程更加透明，使公众意志更好地上升为法律，这也是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表现。公共政策制定就是不同利益群体协商的过程，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让大家进行充分的讨论，可以使公共事务决策和政府行为更加合理合法，这也是法治精神培养的重要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

法律体系讲的是民法、刑法等各个文本体系，而法治体系指的是国家治理方法的体系，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有了很大进步。而在法治体系之下，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法律的原则来办，任何人、任何政党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

——司法部研究室原主任王公义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不但要用好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要用法律约束好自身的行为，把法律融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都要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主任程斌

【发言摘选二】

转型时期律师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文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丁新朝律师



律师作为政治文明的产物，是依法治国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推动中国平稳过渡所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社会各领域改革的逐步深入，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信息技术与金融制度的不断结合，资本的跨国流动、产业的跨国转移、国家“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战略的实施等为律师行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专业律师服务机遇大于挑战

四中全会公报明确要求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同时，依法治国也在客观上要求政府部门需要采购更多的专业法律服务。

对律师而言，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机遇大于挑战。政府部门加大采购法律服务，这将改变律师顾问单位主要是企业公司的状况，未来更多的政府部门也将会成为律师的顾问单位。律师为企业公司提供顾问服务与为政府部门提供顾问服务，会有诸多不同，尤其是法律思维的方式会有显著不同。

互联网金融立法急需专业法律服务

近年来，第三方支付、P2P、众筹等各种平台不断兴起。根据央行截至2014年9月末的数据，我国共有第三方支付机构269家，2014年前三季度共发生支付金额24.1万亿元；全国P2P网络借贷平台1400余家、融资金额超过1100亿元，全国范围内活跃的股权众筹平台有20余家。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与立法滞后，互联网金融已经显现出多重风险，并成为互联网金融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阻碍。

一是P2P平台法律问题。号称国内P2P非法集资第一案的东方创投案为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家敲响了警钟，企业家们开始意识到规避法律风险的重要性。平台上的只是虚拟账户，又要完成线下交易，从项目选择、招标、定标、考察、风险、支付、划账、信息披露、信息系统完善以及诚信指标、评价、项目运行、资金风控、保证责任和均衡运行及追偿权益保护都需要法律服务以及法律保障，也对律师提出了较高专业要求。

二是第三方支付法律问题。在第三方支付业务中，许多基本的法律问题还未厘清，如客户“沉淀资金”的托管问题、利息收入的归属问题、与银行的合作及其风险分担问题、第三方支付的信用担保功能、在支付大数据基础上产生的金融创新的属性和合法性问题等，在法律领域属灰色地带，亟待解决。这对律师行业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

中国企业走出去给需要更多的法律服务

当下，中国企业在国际商业市场中正逐渐成为活跃因素，也正在加大实际范围内的经济话语权。与此同时，带来的国际涉外法律服务市场，是律师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机遇。以境外收购为例，并购方律师的主要工作事项是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目标企业所涉及的法律事项做尽职调查等，这些都有助于为企业家规避风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事实上，不管是涉外法律服务的理论研究还是实务操作，我国均严重缺乏相应的律师人才，这与我国经济大国的发展程度不相匹配。在国际交易中，我国不少走出去的企业也因对当地的法律缺乏充分了解，而导致投资失利，损失惨重。法律人才的成长和培养，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律师行业、律师事务所应当注意加大投入力度，注意引进相应人才，形成专业的法律服务团队。

目前，司法部正以制度安排，来促进中外律师事务所以及内地与港澳律师业开展业务合作的渠道，提升合作水平，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密切合作，更好地向客户提供跨境法律服务。这是律师行业对外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新的尝试和选择，有利于中国与外国律师事务所、内地与港澳律师事务所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共同提升律师服务专业水准和国际业务竞争能力。

【发言摘选三】

构建和谐法务团队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文 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总法律顾问 郭宝辉

企业法务人员和外聘律师都应当认识到建设和谐法务团队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法务人员和外聘律师的作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无论什么关系，业务领域如何界定，企业法务人员和外聘律师都是法律人，是一个团队，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整体。必须让企业特别是企业领导层认识到，企业法务人员与外聘律师都是企业的价值创造者，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一员，让其感受到法律人的人格和业务魅力，感受到法律的力量。

企业法务实践中存在的困惑

企业法务人员与外聘律师同为法律人，应惺惺相惜，精诚合作，共同维护法律和法律人的尊严。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双方还存在不能相互理解与补台的现象，影响了企业法务人员和外聘律师的团队形象。

一是外聘律师合同问题。目前，企业外聘律师合同文本绝大多数由律所提供，合同内容比较笼统，过于原则，而外聘律师的免责条款又过于细致。企业领导层会认为，这些法律服务内容在日常工作中可能会很少遇到，为此支付一定数额的律师费用不值得的。作为外聘律师，能否主动与企业法务人员沟通，结合企业实际确定一些可操作的法律服务条款，如定期组织法律合同培训，定期与企业法务人员对企业行为进行法律审核等，让企业领导层切实感受到外聘律师的实际工作。

二是外聘律师费用问题。在外聘律师时，企业法务人员难以说服领导层支付较高费用，然而高水平律师往往坚持较高律师费用来体现自身价值与能力。特别是企业初次外聘律师时，如何让高水平外聘律师为企业服务，又说服领导层支付合理费用，是企业法务人员面临的难题。此时外聘律师可以表现出高风亮节，主动降低身价，在合理费用基础上签订合同，然后在工作中充分展现自己，我相信对您的付出企业绝不会视而不见。反过来说，外聘律师在发挥作用时，法务人员应主动示弱，甚至可为其申请总经理嘉奖，以凸显外聘律师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及司法环境将更加规范严格，企业法律风险特别是合规风险将成为重大风险必须严格控制，企业法务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

“决策先问法，违法不决策”，国有企业没必要以违法违规为代价获得利益。针对企业法务面临的新形势，作为法律人的企业法务人员与外聘律师如何密切合作，打造和谐法务团队，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是需共同探讨的话题。

企业法务与外聘律师的关系

从法律关系上看，企业与外聘律师是委托合同关系。企业是委托人，外聘事务所或律师是受托人。法务人员往往代表企业与外聘律师洽谈、签订、履行法律顾问合同。

从业务领域界定来看，企业法务主要从事企业内部法律事务管理，属管理范畴；外聘律师为企业提供法律知识和经验方面的专业服务，属法律服务范畴。

从主导与协助关系来看，一般由企业法务起主导、决策作用，外聘律师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起协助作用。但对某些专业性比较强或者重大复杂项目，也可能以外聘律师为主导，企业法务配合。

三是彼此主动工作问题。在实践中，不少外聘律师只是在签订合同和收取费用时才到企业去，企业法务人员也很少主动联系外聘律师。企业领导层见不到外聘律师，外聘律师也没有机会发挥作用。这种情况是双方都不主动工作造成的。我认为，外聘律师应主动收集与受聘企业有关新的法律法规发给企业领导层和法务人员，不定期到服务单位走访，了解企业状况和提示应防范的风险，有效发挥作用。外聘律师来访，企业法务人员要陪同其拜访企业领导，加强与领导沟通。企业法务人员应经常邀请外聘律师访问企业，特别是遇到涉及企业部门之间利益甚至是与企业领导有关又不方便直接指出的法律问题时，可以通过外聘律师指出来，引起企业重视。这样既处理了法律风险，又避免了影响自己与企业内部其他部门的关系，也发挥了外聘律师的作用。

四是外聘律师的选择问题。企业外聘律师已走过为企业支撑门面的时代，企业确实需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外聘律师。企业需要外聘律师在关键时刻发挥企业法务人员不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聘请与企业法务人员业务互补的高水平外聘律师，从而形成企业强有力的法务团队。作为总法律顾问绝不能搞小圈子，要切实站在对企业、对法律事务、对自己负责的高度，必要时顶住各方压力，聘请合格的外聘律师。这是企业总法律顾问的工作底线，这个工作做不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很可能会给企业法务工作和外聘律师造成被动。外聘律师也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维护团队形象。

五是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法律需求问题。目前很多企业面临转型升级，转型升级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的业务拓展到非传统领域，企业法务人员的能力和业务素质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要，而外聘律师由于专业划分过细，还不能提供一站式全过程的法律服务，有时需要找几个律师事务所咨询几个律师才能完成一项工作。但企业领导却非常渴望企业法务人员或外聘律师是熟悉业务、懂融资、会外语、能谈判的法律和商务通才，这给企业法务人员和外聘律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打造信任、理解、支持的企业法务团队

企业的合法、合规、健康运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务团队来支撑。信任、理解、支持则是这个团队构建的基石，是企业保驾护航的力量之源，必须认真把握、运用。

一是互相信任。企业选聘外部律师较为慎重，特别是针对一些重大项目，确定方式更加复杂。经过审慎抉择后，双方都应本着最大诚意信任对方。外聘律师应相信企业会为自己的付出给予合理回报，企业也当信任律

师会勤勉尽责处理好委托事务。这种信任非常重要，会使对方有一种受尊重和被认同感，有利于双方后续合作和良性互动。

二是互相理解。理解产生共鸣。建立合作关系后，企业与外聘律师之间会进入一段磨合期。这段时期内，对于任何一方出现的细微瑕疵或微小失误，对方都应以宽容和理解。同时，也要及时善意提醒失误方，以免类似失误再次出现，从而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

三是互相支持。律师不应把自己仅仅界定为一个代理人，更应该有主人翁意识，除做好本职法律服务外，还应多换位思考，多站在企业角度考虑问题，多提供合理化法律建议，尽最大努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反之，企业有了外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也不能当甩手掌柜，也要做好配合支持工作，如及时准确转达双方意见、准备资料、加强内部协调等。

正确处理和把握团队内部关系

在法律事务实践中，企业法务人与外聘律师要正确认识自身角色定位，建立起良性互动，合理把握双方的关系“度”，共同促进企业发展。

一是掌握好原则与细节。在具体的法律事务处理过程中，企业法务人应当就事项处理要达到的目的，拟采用的法律手段等原则问题做出准确把握和界定，而外聘律师应当在企业法务人把握原则问题时起到参谋作用。在原则问题确定后，围绕服务原则既定的最终目的，相对独立开展专业受托工作，关注业务开展进程中每个细节，朝着设定路径开展工作。重点是在每个细节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人专业优势和良好技巧，努力实现预定目标。

二是体现专业精神。在合作中，企业法务人员应注重对具体的法律事务处理行为进行监控，及时分析外聘律师行为的实际得失，对于存在的偏差和不当行为及时沟通。但在法律事务处理诸多程序上，应当由外聘律师重点掌握，诸如诉讼时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异议期间等程序上，外聘律师应当及时应对，不得由于程序等人为因素造成企业不必要损失。

同时，外聘律师也应注意不得擅自对受托法律事务作实质处理，比如对于是否接受调解、处理金额允诺在内的实质性意见，即便在委托范围内也需征求企业法务负责人的具体意见，避免在处理具体事务时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诚然，受综合能力和专业素质的限制，在实际工作当中，外聘律师和企业法务人员业务划分和侧重点会呈不断变化的态势。但不论如何变化，企业法务人员和外聘律师都应当认识到建设和谐法务团队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法务人员和外聘律师的作用，构建和谐工作关系，为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发言摘选四】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律师业务

文 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 郭星亚律师

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发展，要求我们律师也要不断的创新服务，为法治社会做贡献，这是我们律师服务社会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有所担当，不负重望。



律师服务创新是律师事务所发展的灵魂，也是律师成功的秘诀。深圳律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经超过8000多名律师，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业务创新。90年代深圳律师在为企业股份制改造、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参与公司的破产清算，建设工程的招投标等等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开创了先河。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全球迅速走进互联网时代，律师的法律服务也要与时俱进，创新服务内容，为互联网提供法律服务。

律师为互联网服务的业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为互联网法律服务。由于国家没有对互联网进行专门立法，泄露国家机密、侵犯他人的隐私权都没有法律界定，网络的安全条件、技术标准未得到法律的确认，必然会造成很多纠纷，直接关系到互联网大数据的生成和发展。比如说电子商务当中的电子交易、安全设施，必须要得到法律的确认，电子结算的支付规则也要得到法律的认可。目前，互联网是一个市场经济产物，尚无法律可依，虽然我们国家没有先例可循，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可循，但我们也要呼吁立法，否则容易发生纠纷。

律师可以提供三方面的法律服务：首先，参与互联网大数据的立法活动，将技术条款上升为法律条款，防范互联网风险；其次，律师要为互联网项目重大决策做可行性论证提供法律意见；三是参与法律数据库的建设，收集国外法律，并与相关法律进行比较，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国门提供法律服务。

二是运用互联网思维为企业的公司重组和资本重组收购兼并进行云端设计，云端链接。法律服务是高度依赖专业性和实践经验的行业，根据大数据云计算的大量、多种有价值信息，高速聚集在一起，可以为企业设计生产经营或者资本经营的最佳方案。比如说一个企业想到国外收购兼并一个药厂，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的为他们收集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药厂或者制造某种药品的生产线，帮助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对信息的索取、管理、处理以至于决策。

三是让法律服务与互联网产业融合，促进法律服务互联网化。当今看一个产业有没有潜力，看它离互联网有多远，有互联网思维的法律人才能真正赢得未来。只有法律人才能生产法律人所需要的专业内容的互联网产品。现在，很多律所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产品，为律师、企业提供高效的使用便捷的服务，开发工具性的产品。比如刑事案件，只要输入案件类型，所有历史的判决的数据、证据的情况、律师的辩护思路以及案件的胜诉概率都可以获取。比如要生成买卖合同，只需要把合同类型、标底物的数量、质量、价格输入，就有一份草拟好的合同自动生成，双方确认后电子签名，合同成立。随着互联网的推进，法律服务行业必然被颠覆，也促使法律服务不断跟进时代潮流，不断创新。要想将法律服务 and 互联网完美的融合，律师不仅要以法律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还应该以互联网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互联网时代对律师来说是一个开拓新业务的创新时代，不是走向灭亡的时代，也不是业务要萎缩的时代，刚好相反，它推进律师业务向高端发展。律师为企业服务不光是两个合同，不光是几个文书，而要做云端设计、云端链接，这是律师的责任。律师要加强学习，要跨行业，不但要懂法律，要懂金融，要懂财务。律师向高端发展，不是说请几个助手，在电脑上打几个合同或者法条，那不是现在的律师业务。

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发展，要求我们律师也要不断的创新服务，为法治社会做贡献，这是我们律师服务社会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有所担当，不负重望。

【发言摘选五】

前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思考

文 深圳大学教授 曹龙麒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和律师之间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从权威资料来看，经济案件占现有案件的70%以上，而这70%的经济案件有80%左右是与金融有关，主要是银行、证券和保险等等这些金融机构。

上海自贸区和深圳前海自贸区作为我国两大自贸区，二者存在许多异同点。其相同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背景和目标大体相同。当今世界的战争主要是贸易战和货币战，中国的应对措施就是选择具有一定基础的区域办自贸区，即上海和前海。二是职责和特征相同。这两个自贸区都已经纳入了国家的战略层面，都是在原有的具有良好发展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创新思维推动，不断探索新的路径；都是国家赋予先行先试职责的试验场，前海是深圳特区中的特区，为特区的深化指出新的途径。两个自贸区都体现了全局性、创新性。三是都享有系列优惠政策，发展战略大体相同。两个自贸区都享有国家在金融、财税、法规、人才、教育、医疗、电信等方面有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同时还不仅仅立足于自贸区本身，要跟上国家整体改革开放的步伐，要向全国甚至全世界辐射。四是同样面临很多困难。比如说明确的法治和法规的问题，还有治理结构的问题等等。有很多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原因是我国经济形势下充分的、自有的资讯还不太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垄断性。世界形势的多变和遇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

同时两者还存在许多不同点，主要有：一是发展条件不一样。上海自贸区有28平方公里，深圳前海仅为其十分之一左右。上海自贸区区域面积比较大，辐射了整个

长三角，深圳前海面积较小，但是其毗邻香港、澳门，这个是先天优势。二是发展步骤不一样。上海自贸区步子比较大，先挂牌后运作；深圳前海自贸区携手港澳、小步快跑，先摸索，后定名。三是运作方法有差别。上海自贸区先把负面清单列出来，比如说先锋机构、网站、出版业等18项禁止向境外和外商开放。前海自贸区现在慢慢的开放了，特别是发放人民币贷款、人民币债券、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建立国际性和全国性的经济管理总部，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改革创新永远是两个自贸区生产和发展的命脉所在。深圳发展了三十多年，改革创新是深圳发展的命脉和根基所在，所以我有几点思考：

一是坚持以创新的理念来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在不断深入，社会有很多新的需求出来，这些新的需求需要新的制度、新的体制、新的品种和新的管理模式。招商银行有一句名话：因你而变，你就是客户。招商银行楼下有一幅画，画上有许多葵花，上面是阳光，葵花代表银行的种，阳光代表客户，阳光在哪里，葵花就转向哪里。社会在变化，人们的需求在变化。实现经济转型一定要联系国家改革开放的实际，根据国情，走自己的道路，在金融的层面保持稳健发展。过渡的货币化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假如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经济就会混乱。

二是在整个的创新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导向。深圳的“三化”指的就是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在世界上有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事实证明建立自由贸易区最大的任务是开放市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好的方式，这是国际的经验，也是我们世界文明的经验。当然不要忽视政府在市场基础下的引导和扶持。

三是密切关注新兴金融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金融创新注入强大的新推动力。互联网金融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们已经进入了虚拟经济时代，货币都是虚拟化的。我们反对泡沫经济，但是我们的经济有一堆泡沫现在看来是允许的，没有这个泡沫是不好看的。

最后，要以创办自贸区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上海、深圳、香港三地的紧密合作。只有合作，金融创新才能持续更好更快的发展。

【发言摘选六】

知识产权纠纷中的攻击和防守

文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祝建军

在面对知识产权案件时，宏观层面上要具备扎实的、体系化的法律知识；微观层面上要熟练掌握具体的知识产权案件的攻击和防守规则



今天交流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知识产权人的角度如何从战术、战略两个层面认为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向被告发起攻击；二是从被告的角度，在面临原告攻击的时候应当如何防守。

拳击比赛和诉讼有点像，实际上有四种：一是比赛之前一方直接弃权，另一方不战而胜，好比诉讼中原告起诉以后，被告方直接赔偿损失；二是比赛双方势均力敌，裁判根据点数判决一方获胜，类似原告和被告双方实力均等，证据扎实，通过认真分析才能得出哪方胜诉；三是一方实力非常强，直接把另一方KO，是相当于原告和被告的一方完全打败另一方。拳手在打比赛的时候，根据自身和对手的情况确定自己在整场比赛中攻击和防守的方法。在知识产权纠纷中，作为权利人的原告和被控侵权人的被告如何进行攻击和防守呢？

知识产权人如何发起攻击的方法有以下三种：一是战略层面。当知识产权人认为自己知识产权被侵犯的时候，要认真研究，在众多可能选择保护自己权利侵权基础中确定最恰当的侵权基础。导演张艺谋因影片《千里走单骑》被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局起诉到法院，文化局称影片中所称的“云南面具戏”实际上是首批入选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安顺地戏”，故起诉讨要署名权。由于安顺文化局选择的侵权基础不恰当，最后败诉。当时一个著名的知识产权研究学者说，知识产权法官对这个案件把握还是比较细，律师在选择侵权基础出了问题，导致那些贫困山区

的人丧失了直接和知识产权直接对话的机会，这个案件非常可惜。二是战术层面。选择了正确的侵权基础之后，原告要从战术上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要有一个合法的知识产权；其次是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知识产权；再次是被告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看似简单，但是司法实践中有很多问题。原告作为专利权人起诉被告侵权，但是原告的证据里面，比如专利评价报告显示专利不具备创新性和新颖性，专利的实施性不具备，怎么打赢官司？原告的合法性就出现问题了。三是攻守兼备。在面对被告抗辩的时要有预判被告会如何抗辩，针对被告的抗辩来反驳他的抗辩。被告的防守我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战略层面上，被告抗辩原告的侵权基础不存在，原告应该被剥夺诉讼请求；二是战术层面上，被告抗辩原告知识产权不存在，被告行为不侵权，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在面临原告的攻击时可以变防守为进攻，主要有这几种方法：一是主张对知识产权的合法性进行认定。例如，专利权和商标权是专利行政机关和商标局授予的，知识产权人告被告侵权，被告可以直接到专利行政机关或者商标局主张涉案的知识产权无效，釜底抽薪。二是根据各国知识产权的规定，针对原告的诉讼在不同的法院提起诉讼。比如说华为诉美国IDC案件，美国IDC在美国法院和美国贸易委员会起诉华为公司标准专利侵权，华为作为被告，在中国法域针对美国IDC提出使用许可费的诉讼，同时还选择了一个垄断诉讼，抵消了IDC在美国对华为的诉讼，赢得比较好的结果。三是在我国法域内针对原告发起的知识产权侵权之诉，被告在防守的时候提出新的诉讼请求，以抵消原告已发起的诉讼请求。比如去年腾讯起诉360不正当竞争，360针对这个诉讼提出了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之诉。

综上，在面对知识产权案件时，首先在宏观层面上要具备扎实的、体系化的民法法的理论知识和体系化的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诉讼法律知识；其次在微观层面上要熟练掌握具体的知识产权案件的攻击和防守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原告和被告的对抗中取得胜利。

【观点提炼】



中煤能源集团总法律顾问周立涛做了题为“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能转变及作用”的主题演讲。他表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为依法治企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们说，法律顾问从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经历了摆样子、救火队等发展阶段，直到国家经贸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国家重点企业开展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工作为标志，企业的法律事务才走上了快车道。国资委成立之后，通过三年三个目标的强力推动，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和建设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一是法律意识普遍增强，企业领导普遍加大了对法治工作的重视、支持力度，守法程序是地区生命，违法经营是最大的风险，决策新问法，违法不决策等观念深入人心。二是经过三个三年法制工作目标的落实，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总法律顾问制度和企业法律管理工作体系逐步完善，法律顾问队伍素质和依法治企能力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完整链条全面形成，企业自身违法违规引发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在逐步的减少。三是推动法律顾问积极转变法律服务方式，逐步拓展，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法律保障，拓展到经营决策环节全过程的参与，有效防范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面临着灾难性的法律风险基本杜绝。目前，中央企业正在与国际一流企业进行法律对接，与世界优秀企业相比，中央企业的差距是什么？周立涛表示，一流企业法律顾问人员占企业职工7%，而中央企业仅占千分之一点五。除了人员的差距，国外企业把合规文化当成企业的核心文化，总法律顾问的地位以及法律事务部门的业务和我国也有很大差别。他认为，未来企业法律事务将实现四个转变：从救火队向防火墙转变；从参加会议向参与决策转变；从单一的法律事务管理向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机结合转变；从法律服务型向管理监督型转变。



腾讯集团副总裁、法务部总经理江波做了题为“互联网产业发展不正当竞争问题探讨”的主题演讲。他介绍未来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一是平台化。互联网产业竞争的根本是平台竞争，开放的平台发展战略，能够实现与开发者共赢，促进产业全面发展；二是移动化。移动互联网成为用户的“电子器官”，当前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高速增涨，2013年中国

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比增长81.2%；预计到2017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5800多亿元移动互联网将是中国互联网走向世界的关键机会。他认为，产业竞争激烈、违法成本过低、救济体系不完善等原因是互联网不正当竞争频发的原因。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经历了三个演变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软件干扰，诋毁商誉。主要表现为争夺直接交易机会而针对他人同类产品采取赤裸裸的不正当竞争手段，通过技术干扰达到使消费者不能正常使用他人产品的目的。第二阶段是形态多样，复合侵权。在第二阶段的案件审理中，竞争关系的认定问题、一般条款的适用问题、消费者权益在竞争法视野下的考量、技术进步和自由创新与竞争法的关系问题等，在多数案件中得到了充分阐释，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所需考量的基本架构初步构建。第三阶段是裹挟用户，强行搭车。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法务官郭建军在民企法务建设的经验主题演讲环节做了题为“现代法务管理学的体系构建”的主题演讲。他认为，目前，中国企法务管理还处于短板，经济发展推动公司法务不断发展，在公司的运营中，公司法务在三个方面体现价值：一是控制风险；二是商业竞争；三是公司盈利。他总结公司法务管理学五个制度，作为公司法务管理的基础理论。一是合理遵循理论，若想做大做强公司法务，合规监管、合规审计是非常好的切入点；二是风险管理理论，将公司法务管理提升到整个公司的风险管理的高度，打开公司法务的瓶颈，推动公司法务更大的发展空间；三是竞争战略理论；四是知识管理理论；五是首席法务制度。他认为，提升公司法务管理的核心不是合同、案件、法律咨询、培训传统的法律业务，而关键是合规、经营、竞争。



著名刑辩律师栾少湖在“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立法新动向”主题讨论环节，做了题为“防控单位犯罪是企业法务的必修课”的主题演讲。他认为，除了个人涉及到自然人犯罪的风险，单位犯罪是企业法务人员必须直面的问题，单位犯罪已经成为阻碍企业正常发展的绊脚石。在实践中，单位犯罪出现了

若干新情况、新问题，国家在立法上是呈现逐步扩大的。单位犯罪是可防可控的，所谓的风险和威胁，最可怕的是不可预知性，单位犯罪结合整个公司的运作、流程，完全可提前防控。就单位犯罪如何真正提升企业法务在企业的应用价值，他认为，建立可预警的单位犯罪防控系统，把它镶进原有的民商事法律风险、合同审查的日常法律流程中。单位犯罪，刑法的板子是打到直接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以及单位与法定代表人屁股上，道德的板子应该打在企业法务的屁股上。防控单位犯罪是企业法律顾问是一堂必修课，新形势下要把法律风险防范、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加入到企业法务的职责范围当中，压住、减少、消灭、不发生单位犯罪。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如何防止单位犯罪是企业法务上交的第一张试卷。



招商局集团副总法律顾问王春阁在“粤港澳法律服务市场融合中的机遇”主题演讲环节，做了题为“通过内地仲裁，解决香港中资企业及在内地港资企业经济纠纷，为内地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的主题演讲。他主要从香港中资企业概况、在香港解决纷争的途径及收费情况以及香港中资企业在内地仲裁解决经济纠纷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他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在港中资企业已达5000家以上，还有许多隐性的BVI公司，这些企业在香港都有业务。其中H股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红筹股公司和地方窗口公司虽是在香港注册，但都有许多业务在内地，难免产生涉及两地的经济纠纷。如果选择在香港进行诉讼或仲裁解决纷争，律师费和诉讼相当昂贵。改革开放以来，港商在内地设立的合资、合作及外商独资企业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港资企业，有的是前店后厂式的，即生产基地在内地，销售及出口业务在香港，有的虽在内地经营，也通过香港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内地的港资企业，也难免发生涉及两地的经济纠纷。在香港，发生案件纠纷，可以通过香港法院、香港仲裁和调解的途径解决。自2009年开始，香港与内地仲裁机构合作进行尝试，主要包括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商事调解委员会、深圳将在前海引入香港仲裁机构、香港律政司与中国贸促会的合作、深圳国际仲裁院、香港律政司与深圳市政府的合作。他总结，通过内地仲裁解决香港中资企业及在内地港资企业经济纠纷，将为内地法律服务业提供更多机遇。内地法律服务人员既可以代理人身份参与仲裁案件仲裁或执行程序，也可以仲裁员身份参与仲裁案件审理，也可为两地企业提供相关法律咨询。

在“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预警与防范管理”沙龙环

节，深圳市智汇远见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宇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祝建军（发言摘选六）和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韶斌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刘宇波做了题为“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为企业知识产权做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如同给病人看病，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对症下药。倾听管理者的痛点，通过情势分析、知识产权课题分析和自身资源的分析，详细了解企业的问题所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二是融入流程。结合公司实际流程是外部律师与企业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外部律师要熟悉企业整体流程找到所依托的流程、评估流程中的岗位和适格性以及评估流程嵌入点带来的额外成本。三是形成文化。他认为，我国的整个司法环境对知识产权保护要起到正确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从而才能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文化的保护。



朱韶斌律师做了题为“从近期美国专利诉讼来看如何管理您的知识产权风险”的主题演讲。他分享了在美国我们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进行投资、经商，如何管控知识产权风险。他介绍美国专利诉讼主要是从美国联邦地区审判法院（94个）、国际贸易委员会“337调查”以及美国专利商标局三个方面实现，其中前两者属于司法或者行政法院的性质，最后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或提审最高法院审阅，但是比例很低。大部分案件到美国专利局中专利审判和专利委员会进入专利无效程序。在美国，被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主要集中在制造、使用、销售、或许诺销售方面。被诉后主要有三方面风险：一是损害赔偿金：高达百万、几亿美元；二是失去美国市场业务机会；三是损失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美元诉讼成本。为管理知识产权风险，要建立自己强有力的知识产权组合，利用合同分配知识产权风险，通过许可和交叉许可，在美国专利局挑战威胁专利的有效性。他建议，中国企业在收购外国企业时，不能仅停留在表面，收购之前要对知识产权做详细的尽职调查，要看究竟价值有多大，发现问题越多，对谈判越有利。

在“内部法务与外聘律师的合作共赢”主题讨论环节，中电电气集团副总裁西小虹、阿里巴巴高级法律顾问吕长军、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总法律顾问郭宝辉（发言摘选三）、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张燃做了主题演讲。



西小虹做了题为“内部法务与外部律师之并肩作战”的主题演讲。他介绍了内部法务和外部律师之间的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是相互取长补短。内部法务是企业的雇员，属于企业高级职工，专门为本企业依法经营管理提供法律意见和从事法律服务协调工作，而外部律师是自由职业者，面向全社会服务，侧重于诉讼，双方有专业的重叠性和各自擅长领域的互补性。二是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内部法务对内部业务部门、相关的人员熟悉，清楚企业内部运作方式和逻辑，外部律师要发挥外脑，发挥律所专业律师的强项和作用，使双方达到共赢。三是无论是外部律师还是内部法务，在处理项目或案件时，要知己知彼，准确把握己方、对方、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并始终铭记于心、落实于行。他认为无论是内部律师还是外部律师，对自己的定位和功能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法务不是魔术师，法务只是最好的医生，根据病人的情况给出最好的医疗方案，挽救病人的生命。



吕长军做了题为“互联网法务价值的实现与外部律师的价值发掘”的主题演讲。他详细介绍了互联网公司法务的特点：一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跟计划经济无缘，受到的行政干预非常少，使得互联网企业天然的就具备了一种“自由的精神”与“强健的体格”；二是市场经济主体内在的需求与互联网思维造就了当下互联网公司的法务战斗力、主动性和专业性的特质。就如何实现互联网公司的法务价值，他认为：一是要服务业务，贴近业务，指导业务；二是要发现行业的前沿问题并及早研究。互联网行业总是遇到新问题，一定的研究能力是必备的能否发挥互联网的影响力；三是要解决问题并得到业务的认可。他认为公司法务并不是包打天下，外部律师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从三个企业需求考虑挖掘自己价值：一是专业性的法律合规需求（如投资、并购）；二是专业化、精细化的研究需求；三是高水准的诉讼需求。



张燃律师做了题为“公司法律顾问需求变化及其应对”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作为律师，要善于积累与公司法律服务业务，了解企业的法律需求，包括诉讼和非诉讼方面，甚至为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管理建言献策。根据多年的公司法律顾问实操经验，他总结了公司法律顾问业务变化的趋势：一是专业性要求增强。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时代的来

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挑战，律师法律顾问，传统的接电话、咨询、改合同的工作做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客户的需求；二是多样性变化加剧。公司作为虚拟的法人主体，在这个经济当中，从公司设立到成长、壮大到对外的扩张、投资、融资，再到产生子公司、孙公司，不断发展，乃至到最后有的企业走破产清算，每个过程都有不同的法律需求；三是时效性缩短。目前，律师人数每年以较高的比例增长，律师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对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如何打造新型的法律服务团队，应该考虑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每个人的需求，对于刚刚入行的律师助理来说，更多的是注重团队所创造的学习机会，而对于专职律师最关注的是业务机会，最后，在合伙人阶段，是自由、成就感、生活质量还有实现自我价值。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法律服务创新”主题讨论环节，欢聚集团副总裁、首席法律顾问齐守明、律商联讯亚太区产品研发总监陈昊、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郭星亚（发言摘选四）、深圳市律师协会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张强做了主题演讲。



齐守明做了题为“互联网思维下法律服务创新模式探索”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在当前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传统行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全球各大机构的法律需求不断增长，律师不能坚守传统的法律服务模式，而要改革、变革和创新，用互联网思维提供法律服务。互联网思维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市场、对用户、对产品、对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的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他从6种互联网思维畅谈了法律电商如何服务。一是免费思维。互联网的最基本思维，首先通过提供免费服务打造自己的口碑，进而提供法律服务方面的强需求，比如商标、专利的申请、域名注册、备案问题，还有后续有资本进场时，对投资人权利进行保护等问题。二是大数据思维。建立数据库，利用大数据系统对个案报价进行评估分析研判，减少律师主观臆断。三是用户的细分思维。善于对法律服务的用户进行细分，进行个性化定制服务。四是开放及共享思维。目前，有一家为全球用户提供中国法律服务的云服务平台。五是电商思维。新崛起的法律服务机构的业务操作模式，采用典型的用O2O来做法律服务，即进行线上接单，之后分发给后台合作的律师，律师完成工作再反馈给平台，平台再反馈给用户，用户可以对律师的服务能力、服务质量、响应时间等维度进行评价。六是智能化思维。以美国硅谷的虚拟律

师事务所为例，该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开发了一套强大的云通讯服务系统来完成所有律师服务的线上接单、报价、沟通、服务还有成果输出等一系列律师日常需要的活动，是要用智能工具辅助整个法律服务的流程。



陈旻做了题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法律服务创新”的主题演讲。她认为，互联网时代加剧发展，信息数据以爆炸式增长，以往通过邮件发送一些法律信息的方式以不能适应当今法律服务的需要。互联网法律服务时代，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获取法律信息，就是要整合业务各个环节，构建以信息为中心的创新应用，使法律信息不再孤立，通过科技的手段把法律信息抓取和关联，提高筛选法律信息的能力，使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张张做了题为“深圳律师在法律服务创新方面的探索”的主题演讲。他介绍，深圳律师在服务模式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并列三个例子：第一个是探索式的创新——律伴，号称是口袋里的律师团，是法律移动互联网平台，有四个特点特别显著：一是律师实名注册，没有冒牌的，能够保障服务的专业性；二是对律师全免费；三是作为客户很方便的在这里面实现简单的咨询以及对律师的选择；四是产品运行之后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交互功能，它能够实现客户和律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第二个福利法务计划。是差异化思维方式创新，由企业作为团体为成员采购福利法务，用统一的福利法务计划进行咨询和服务，实现了普法功能。第三个是公益法律服务超市。政府通过采购律师的服务，由律师创设一个实体的公益法律服务超市，在服务超市的平台下实现对社区居民的法律支持和法律咨询。他介绍，我市律师在探索建立标准化体系建设：一是基本服务准则；二是业务指导标准；三是收费指导标准；四是事务所管理指导标准；五是行业协会服务标准。

在“商事争议解决的变化及创新”主题讨论环节，万科集团首席律师颜雪明、21世纪不动产高级法务总监李宜坤、深圳仲裁委员会发展处处长、金融仲裁院副院长董连和、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学明做了主题演讲。

颜雪明做了题为“争议、规则、裁判”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一是能被自觉遵守的规则才是好规则。以羽毛球比赛为例，业余选手比赛，不需要裁判，也极少争议，民间活动的主体，都有自发的遵守规则的愿望，有自律形



成的秩序，无须外部干预，也能正常运行。而重要的专业比赛，每场配12名裁判，还会发生错误。民商事活动过去没有严密的立法与司法，主要靠自然法、习惯法，相当于没有裁判的羽毛球场。

现代社会，制定出台了許多法律法规，但其中许多法不具有正当性。二是大量纠纷产生于不正当的行政管理。三是经济领域大部分行政管理环节都可以取消。不正当的规则与不专业的裁判，只能增加纠纷。四是减少不必要的裁判就能减少纠纷。取消了不合理的规则，赶走了捣乱的裁判，争议就会减少，秩序就会正常。他总结，与其讨论争议解决途径的创新，不如想办法减少争议，而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莫过于简化规则、减少裁判。



李宜坤做了题为“‘海恩法则’对企业案件管理的启示”的主题演讲。她从如何从案件处理向案件管理转化；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进化；通过案件管理提升法务价值三个角度进行了介绍。海恩法则是德国发明家提出的发行安全法则，即：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次尾随以及1000次事故隐患，之后被普遍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中。海恩法则的启示：通过案件看到案件背后的问题，要帮助企业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套流程，最终解决一批隐患，防患于未然。她重点介绍了事前防范，一是合同管理。认为合同是企业的利润之舟。其次合同是交易的策划，业务的体现，公司对外的承诺，企业管理的工具。公司法务和律师是通过合同支持公司所有的业务，帮助公司实现业绩。二是系统风险管理。主要包括：第一是股权战略，主权问题，也就是公司产权归属、股权设置、公司实际控制权等最核心权利分配问题；第二是治权战略，是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包括公司的管理架构，表现为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工会、职代会的权限设置及相互关系；第三是经营战略，是公司的合规经营和管理问题，涉及供、产、销、人、财、运各个领域的合规运做；第四是知识产权战略，是公司品牌规划与保护问题，涉及商标、版权、域名等无形资产的注册与保护；第五是企业家保护战略，企业家是企业最核心的组织者、领导者、管理者，针对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董事身份、监事身份、总经理身份、财务负责人身份的风险防范。她总结昨天的竞争靠成本，谁成本低，谁就有竞争力；今天的竞争靠技术，谁能创新技术，不断地研发出技术附加值高的新产品，谁就有竞争力；明天的竞争靠风险管理，谁少犯错，谁不犯大错，谁就有竞争力。



董连和做了题为“从仲裁实务谈商事争议解决的变化与创新”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仲裁的权利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仲裁程序的引导都以当事人自治为核心。通过多年的仲裁经验，他总结了商事争议解决的特点：一是案件受理类型“多样化”；二是争议解决方式“多元化”；三是仲裁服务更为“人性化”；四是居中裁判走向“专业化”；五是机构发展谋求“国际化”；六是程序推进实现“信息化”。



陈学明做了题为“关于深圳市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我见”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律师应积极参与司法体制改革，从深圳看，律师对司法体制改革参与度较低，原因有：一是司法机关不重视律师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作用；二是律师自外于司法体制改革。他建议司法机关应向律师通报改革试点方案，并向律师就改革思路做说明；律协应主动加强对深圳法院系统改革的关注和参与。他重点谈了关于深圳法院系统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几点建议：一是对于审判长负责制或主审法官负责制建议彻底将裁判权赋予法官，取消主审法官批案制和负责制，实行合议庭多数意见法官负责制。二是应重视引入法律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士作为陪审员；借鉴香港非常任法官委任制度，积极探索委任资深且职业道德较高的律师、法学教授和法学研究人员做候任法官备选；如此，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深圳法官人才不足的问题；加强职业共同体内人员交流，提高司法裁判的质量和效率。三是裁判文书的上网公开，有助于增加司法的透明度。但是，为增加裁判文书的透明，强化法官的责任意识，加强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关注，建议：裁判文书应载明少数人意见；律协应组织专家加强对公开裁判文书的学术评述。评析裁判文书的得失，引领风气。

在“海外投资及企业并购的法律问题”主题讨论环节，武钢集团总法律顾问刘新权，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杨关善，山东鲁商集团法务部部长王茂松，上海电器法务部经理王君炜，香港律师会理事及前会长林新强做了主题演讲。



刘新权指出，一个海外投资的项目分为决策阶段，商务谈判阶段和运营管理阶段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风险及特征是不尽相同的，防范化解措施也不同。前两个阶段中国企业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但项目落地之后的运营管理对中国企业是巨大挑

战，除了协议规定的必须的责任以外，还有非制度性的、工会组织的监管等。项目落地后，如何在不同法律环境，不同制度，不同文化有效整合资源，使企业稳健的运营发展？他建议在海外做事一定要经常跟中国使领馆沟通，考虑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有没有双边投资协定，投资项目在当地政府政策里的问题，要大使馆，在他大使馆的指导下推进项目。



杨关善做了题为“境外投资法律风险防控若干问题探讨”的演讲。他以公司法务管理为视角，从六个方面进行了介绍。一是境外投资居间商的甄别与合作。作为律师和公司内部法务，要向领导建议与中介签订相关的居间协议，把各方利益锁定，风险锁定，甚至中介可能发生的费用，出现交通事故的责任进行预设。二是投资前期款项支付的控制。不轻易支付预付款，并设定预付款担保和争议解决措施。三是法律尽职调查的分阶段开展。第一阶段是初步尽职调查：抓关键、保重点，速战速决，节约成本；第二阶段是全面尽职调查：全覆盖、深钻研；第三阶段是严格评审尽调查报告，在交易合同中体现调查成果。四是投资架构设计的风险因素。以税务筹划为依托，设计以离岸公司为中间层的复杂投资架构，风险不可忽视；为确保层级管理的有效性，控制股权争议引发的送达风险。五是投资项目运作的合规性。依法合规开展投资，避免留下法律瑕疵，并向商业贿赂说“不”。六是仲裁条款的正确适用。涉外合同仲裁条款的正确适用问题更为突出。



王茂松做了题为“商业零售业投资并购项目风险控制”的演讲。他提出，进行海外投资，用综合尽调的方法做系统考量。即由公司总法律顾问牵头，由法律部门、财税部门、人力资源部门、业务部门参与，引进物业部门等，确定投资可行性、进行投资决策的依据；确定交易架构的基础；增加谈判筹码发现交易标的物瑕疵，避免交易风险。他建议公司法务、律师在做投资并购项目时，要做系统的风险管理，同时要具备战略、成本、市场、共赢、管理五方面意识。



王君炜做了题为“从法务视角看境外投资并购”的演讲。他分析境外投资风险并购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政治风险，建议公司时刻保持与当地使领馆包括政府的密切沟通，把握好政府的导向，做好预案；二是法律监管风险，建议公司在尽职调查当

中尽善尽美，对某些需要用户、客户、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做相关的承诺。法务部也对公司核心市场做前期的研究和调研；三是财务风险，主要包括融资方式、汇率、税务等；四是整合风险。基本上70%的并购失败最后都是源于并购后整合出现了问题。他认为境外投资并购有八个关键节点：一是战略决策，是一切并购的基础，就是商业意图；二是交易架构，总结的一些口诀，和意；三是估值对价，对项目做前期测算；四是技术，技术换市场是很多合资的一个初衷；五是尽职调查，发现问题、沟通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六是不竞争条款；七是文本谈判；八是并购整合。包括战略、人事、财务、体系制度，甚至IT系统，最难的是文化。



林新强做了题为“内地企业走出去需强化法律和风险意识”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基本分为融资和并购两个方面，对于走出去的企业首先要熟悉对方国家的法律，其次要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理解企业需求。他归纳总结了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一是政治风险：敏感行业或涉及国防高科技；二是法律风险：反垄断法或当地对并购行为的制约规定；三是财务风险：融资方式、资金或成本等；四是其他知识产权，市场和经营的风险。

在“前海视角下的金融、法律创新”主题讨论环节，前海管理局经营发展处处长沈华新；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处高级经理苏小勇；深圳大学教授、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原主任曹龙麒（发言摘选五）做了主题演讲。



沈华新做了题为“前海竞争优势与价值投资”的主题演讲。他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了介绍。一是前海作为国家战略的四个功能定位。第一是现代服务业的体制机制创新区，是前海更重要是在服务业的体制机制上要做一些探索和尝试；第二是服务业发展的集聚区，来推动和引领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是要进一步在这里推动粤港、深港深层次的合作，从以传统的大家知道的深港在经济领域方面的人才、信息、货物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往更深层次迈进；第四个是珠三角升级的引领区。二是前海的竞争优势。前海地处珠三角核心地带，毗邻深圳机场和香港机场，地理位置有先天优势。三是前海试验田的创新。第一是境外贷款，前海企业可以向香港企业申请人民币跨境贷款；第二是境外发债；第三是跨境集团的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第四是人民币的意愿结汇。四是营商环境。最重要的是法治环境，前海大力发展整个法治服务机构，例如：前海法院、国际仲裁院、蓝

海法律服务中心、省司法厅批准在前海设前海公正处，这些机构的设立，促进了法律服务与境外律师接轨；五是合作举措。预计到2020将吸引一万家港企，三分之一的土地面向港企，吸引10万港人，香港服务业规模达到1000亿，建立10个香港产业基地。



苏小勇做了题为“新常态、自贸区与金融创新”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利率市场化提速，金融机构通过扩大负债、吃利差的传统盈利模式已然行不通。金融业要逐渐适应负债成本上升、资产业务盈利下降的不利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金融创新。体制、产品、渠道、服务、管理是金融创新的基本思路。在自贸区的创新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池。境外资金进入境内，国家采用倒逼机制。二是境外投资审批。三是利用跨国公司的资金管理模式等。近两年金融行业收益整体下降，实体企业盈利普遍下降，风险项目在增加，金融创新也存在法律问题，例如：过渡依赖抵押、司法态度对金融创新的滞后问题。对于自贸区来说，一是大多采取负面清单管理，会造成区内外企业民事行为能力差异问题；二是备案管理对合同效率存在的影响。

【后记】

近日，2014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北京会场）召开，主题为“建设法治中国 重启丝绸之路”。

高树会长代表主办方在致辞中说，年会的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来自律师界和公司法务的相关专家和负责人，以建设性、专业性和包容性的态度，就共同推动和落实四中全会有关法治精神、法律服务建设，尤其是新时期公司法务工作的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更难能可贵的是，公司法务工作专家和律师代表均从法律人共同的视角，就贯彻四中全会关于社会执业律师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分类管理和合理流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表明社会执业律师和公司律师能够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大局出发，共同推动法律服务与公司法务工作的双向融合和互利共赢。他希望，通过与会嘉宾和代表就相关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取得丰硕成果，并期待通过本次论坛进一步打开一扇扇对话交流之窗，开启一扇扇合作之门。

北京会场年会议题除了探讨依法治国战略中的法务机遇与挑战、新丝绸之路法律风险与防范、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解读的主题演讲之外，还包括公司律师与法律顾问制度的衔接与协调、互联网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新话题，同时兼顾知识产权、商事争议解决、总法律顾问定位等传统话题中的新问题。

“锁定房源”法律性质分析

文 广东信荣律师事务所 张茂荣律师

2014年11月28日媒体曝出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深在售的4个楼盘2000多套房源被“管理局锁定”（简称“锁定房源”），其后经历个别项目解锁再锁、股权变更、资质暂停、董事会成员变更、多次停牌、深圳项目全面叫停、高管辞职、甩卖上海项目、主席辞职、债务违约、信用评级下调、合作伙伴撤资，直到15年1月6日传闻破产重组，今日发布澄清公告，短短40天，佳兆业遭遇了“锁定房源”生死劫，且继续发酵中，“佳兆业”事件由此产生。

关于佳兆业房源被锁定的原因，坊间、媒体和购房者多有猜测，而政府部门至今不予透露，佳兆业亦宣称不知，笔者认为：原因难测在于“锁定房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处罚措施，只是政府行政审批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事件，其适用条件、适用范围、解除条件、解除程序均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但其结果却等同于责令企业停业，具有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后果，具备可诉性，佳兆业有权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现分述如下：

“锁定房源”含义

“锁定房源”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网站一手房源项目信息公示“状态解释”，“管理局锁定”指房屋处于限制状态或开发商存在违规行为，导致售房系统被管理局锁定，根据该解释，房源锁定后开发商将无法再办理商品房的销售，即无法办理预售备案、产权转移登记等相关事项，本质等同于禁止开发商售房。

“锁定房源”法律性质、本质属性

一是“锁定房源”不属于规范的行政处罚措施。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行政处罚的种类有七个，即：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

处罚。政府主管部门锁定佳兆业待售房源不属于上述行政处罚中的任何一类。在做出锁定房源决定之前，没有告知佳兆业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没有告知佳兆业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没有组织听证；没有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故不属于规范的行政处罚措施。

二是“锁定房源”具备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后果

虽然“锁定房源”不是规范的行政处罚措施，但由于开发商预售房屋必须通过网上完成，“锁定房源”的结果是开发商无法登陆网络完成预售备案、转移登记，无法销售已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屋，无法经营运转，无异于停产停业，后果十分严重（从佳兆业房源被锁定40天从兴旺到濒临倒闭即可看出）。

三是“锁定房源”是对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否定。

众所周知，我国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证制度，预售前必须依照《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规定取得政府部门核发的预售许可证。预售许可证是政府审核通过同意开发商预售房屋的合法凭证，开发商取得预售许可证预售房屋后，政府又“锁定房源”导致开发商无法预售房屋，本质是对预售许可的否认（不执行自己颁发的《预售许可证》）。

四是“锁定房源”属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具体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的有关其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锁定房源”虽不属于行政处罚措施，但也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已签购房合同效力不受“锁定房源”影响，不能履行佳兆业应承担责任

如上所述，“锁定房源”属于政府对佳兆业的单方具体行政行为，是佳兆业与政府之间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纠纷。而已签认购书、购房合同属于佳兆业与购房者之前的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两者合同主体、法律关系完全不同。故佳兆业不能因房源被锁定无法履行与购房者之间的购房合同而免责。因此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佳兆业应向购房者承担违约责任。至于由此产生的损失，佳兆业可另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解决。

佳兆业若崩盘 业主该如何自救

文 广东深锐律师事务所 夏乾海律师

佳兆业房源被锁定引发的佳兆业危机愈演愈烈，业内人士一致看法是佳兆业崩盘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佳兆业危机已经引起了广大购买佳兆业房产业主的恐慌，已经发生业主集会维权等事件。

深圳张茂荣房产律师团队及时提出了《佳兆业购房资金风险及其化解》，分析了购房者购房资金的三种法律风险：一种是付了全款或者大部分款项的购房者享有优先受偿权，风险较小；第二种是只付了少部分购房款的没有优先受偿权，风险非常大；第三种是只支付了定金等的，没有优先受偿权，风险非常大。也给购房者提出了三种应对措施：一是已付款房源被锁定的购房者可以共同委托专业律师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提出诉求，要求解除房源锁定，仍不能解除可以利害关系人身份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规土委解除锁定。二是已付少部分款需要继续支付房款的购房者，可以委托律师向卖方发送行使不安抗辩权通知函，通知卖方在房源解除锁定之前中止支付房款，以免擅自停止付款被动构成违约；三是所有购房者都可以联合推选代表依法有序地向政府主管部门表达合理合法诉求，争取不要成为佳兆业事件的受害者，相信政府也会考虑到事件的群体性及购房者的无辜予以综合处理。

对于张茂荣房产律师团队的分析以及化解措施，广东深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夏乾海律师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来与张茂荣律师团队磋商，亦供律师界同行和广大业主参考。

首先购房者资金风险的问题。（张茂荣律师团认为是三种，笔者认为只有两种）

一是已付全款或者大部分购房款的购房者享有的是房屋的所有权以及相应土地的使用权，并非优先受偿权。

优先受偿权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在建设工程领域，在优先受偿权有效期内，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没有对何为“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做出具体的量化解释，一般认为超过60%为大部分，超过50%为超过一半。所以，对于张茂荣律师团队认为这部分购房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这一解释，笔者表示不赞同。

那么，这部分购房者是否如张茂荣律师团队所说的风险较小呢？笔者认为：未必。业主面临可能无法收房的后果，购房者支付的购房款在三种情况下依然可能打水漂。

第一种情况是如果楼盘停建成了烂尾楼，即便业主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也于事无补，因为楼盘尚未建成或者半停工状态，更不用说验收交楼的问题，业主无法收房、

>>上接第23页

已签约购房者享有“不安抗辩权”

虽然“锁定房源”不影响购房者与佳兆业之间购房合同的效力，但毕竟面临佳兆业因此无法履行合同的法律风险，购房者不可能明知风险存在，眼看房价上涨而继续支付房款等候佳兆业违约赔付违约金。对此，笔者认为，购房者可以依法行使《合同法》第68条赋予的不安抗辩权，有权在付款期限到达后通知佳兆业中止付款，待佳兆业解除所购房源锁定或提供相应担保后再行付款。

佳兆业目前的对应之策

“锁定房源”已导致了佳兆业的濒临倒闭，佳兆业应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立即向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如复议不被受理或受理后予以驳回，应尽快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命将不保，不应再惧怕“民告官”）。

行政执法检讨

“锁定房源”不公开执法、非罚重于罚的四不像措施不符合依法治国方略和深圳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要求，且与《行政许可法》不符，正确的做法是依法行政，如果佳兆业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应当严格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予以行政处罚，并告知佳兆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而不是故意隐瞒执法依据和执法原因未经处罚决定直接限制出售（锁定房源只是处罚决定的执行程序）。

后记：“锁定房源”原因猜想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网站提示及实践处理，锁定原因一般都是因为开发商存在违规销售的情况，如擅自变更规划等，不会因为个别股东违法违纪锁定，但不排除接其他执法机关通知执行锁定、限制出售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规土委或真不知被要求锁定的原因（本文分析仅针对国土委自身执法程序而言）。

无法入住使用、无法办证。业主只享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无法实现。笔者曾代理过多户上海客户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广西北海、海南等地购房后至今无法入住、无法办证的案件，法院最后判决驳回购房者交房和办证的诉讼请求，原因是涉案楼盘一直没有验收合格。2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买房人有的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交了全款的房屋，依然没有着落，成为两辈人心中永远的痛。

第二种情况是楼盘建好了没有移交给开发商，由于施工方的工程款没有得到偿还，施工方对建设工程是有留置权的，施工方占着房子不腾出来，买房人也没有办法收房。这类案子我也代理过，施工单位占着房子给民工住不交出来，购房人起诉要求施工单位交房，却面临如何查清工程款是否结清、施工方是否有留置权等诸多问题，执行更难，案件一波三折，费时费力，绝非易事。

第三种情况是清盘，也就是假如佳兆业破产清算，业主短期内或者全额收回购房款的可能性也不大。原因是破产清算绝非易事，因债权人众多，债务关系复杂，时间也许拖得很长很长。再有购房者支付的房价是建立在楼盘和配套设施完全建成、小区物业管理良好、佳兆业品牌影响力巨大等有形无形资产巨大的情况下的虚高房价，一旦楼盘烂尾，这一切都不复存在，购房者支付的高房价，换来的也许只是一堆堆砌起来的钢筋水泥，而售楼书上的精装修、豪华配套、舒适生活统统不复存在，其价格岂能与当初支付的高房价相比。

二是未支付大部分购房款的购房人只是享有普通债权。如果佳兆业破产清算，能够清偿工程款以及银行贷款都没有保证，普通债权能够得到偿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风险非常大。此处同意张荣茂律师团的分析。

其次业主的应对之策。

笔者认为，张茂荣律师团队提出的业主要求政府解除房源“锁定”可能于事无补，况且，锁定的房源大多数属于没有销售的房源，业主亦无权要求政府解除锁定。解除锁定的行政诉讼主体应当是佳兆业公司而不是业主，除非业主购买的房产被锁定。根据本文以上对购房者的风险分析，相信业主也知道解除房源锁定意义不大，关键的问题是佳兆业玩不下去了，所有业主的风险都会非常大。

那么，此时此刻，不同的业主应如何自保尽量减少损失？笔者认为：

首先已支付全部房款或者大部分房款的购房者不宜选择退房，除非有把握拿回全部购房款。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已预告登记已支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房款的购房者拥有所购房屋的所有权，而法律上所有权是优先于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优先受偿权、银行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也就是一旦佳兆业破产清算，房子还是购房者的，任何人都无权拿走属于你的房产。而一旦购房者选择退房，除非你确保

能拿回你的全部房款，否则合同解除后，购房人支付的房款就变成了普通债权，面临的是钱房两空的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局面。

其次已支付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的客户，如果已经能交付入住的房产考虑尽快入住。这里主要居于几点考虑：一是防止开发商为了还债有可能一房多卖，在一房多卖的情况下，谁先占有房产就显得至关重要，很多情况下先占有房产就意味着你优先取得房产，其他人只能申请开发商返还购房款和赔偿，而在开发商破产的情况下，返还购房款和赔偿都是扯淡的事，拿到房产才是真家伙。二是防止如本文前面所讲的施工单位行使留置权，就算最后法院判定施工单位留置权不成立，经过施工单位留置的房产里面的精装修、家具设备估计也被洗劫一空了。法律也不是都公平的，很多时候也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

再次只支付少部分购房款的客户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与开发商私下协商，看是否有机会拿回购房款，大规模组织业主协商的方式绝对不可取，因为开发商没有这个能力，也不能大面积这么做。

第二种选择是继续支付购房款达到法律要求的大部分，将自己只拥有对开发商的普通债权升级为对房产的所有权，并据此要求政府解除对自己所购房源的锁定，办理预告登记。如果政府不解除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当然，这样做最后就算最后解除了锁定也是有风险的，具体不再重复。

第三种选择是按照张茂荣律师团提出的行使不按抗辩权，避免损失继续扩大。不按抗辩权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合同法》第68、69条，68条的规定是：“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第69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68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不按抗辩权行使一段时间后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尽快采取法律行动要求法院尽快判决尽快执行。

最后也是所有购房者应当做的选择：理性的、合理的、依法向政府部门提出诉求，请求政府部门保护小业主的权益不因开发商的违法违规而无辜受损，很多业主购房都是倾其一生所有甚至几代人的积蓄，广大业主们绝对是无辜的，其财产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佳兆业事件事发突然也较为敏感，以上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仅供业主参考和同行特别是张茂荣律师团队一起讨论。

新环境保护法热议

文 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 陈旭绯律师

随着2015年新年脚步的日益临近，新的《环境保护法》这部关乎民生的重大法律也即将正式施行。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愈来愈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或已成为了影响人们生活乃至生存的重大问题，在社会各界多年来的呼吁和期待下，这部号称“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破冰出台，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创设了不少新的原则和环境法律制度，外界评价为亮点纷呈，本文着重针对新的环境保护法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对新环境保护法施行后能够改善目前严峻的环境局势的状况进行展望。

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背景

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历史

1972年6月5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环境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标志着环境污染和环境公害问题首度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政府当时也派代表团参加了那次会议，并在会议文件上签字，承诺要与各国合作来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1979年9月13日，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通过，该法分七章，共33条。值得注意的是，该法中没有设立“法律责任”的章节，而是以“第六章 奖励和惩罚”取代法律责任一章，在这“奖励和惩罚”一章中也仅有两个条款，这样的设置或与当时我国的经济的发展速度较慢，环境污染问题不突出有很大的关系。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劲风吹拂，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步引起重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与完善也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于是经过十年的酝酿，到1989年12月26日，正式的环境保护法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自通过之日起开始施行，到目前为止，我国适用的环境保护法的仍是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共分六章47个条文，分别为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第四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第五章 法律责任、第六章 附则，可以说，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奠定了我国环境保护

法的基本章节架构，新的环境保护法亦是基本沿用了这一章节架构。

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

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施行之后的那段时间恰恰是我国经济增速最快的时候，由于长时间粗放式的经营方式，高能耗、高污染及资源型企业大量存在，大量的能源、资源消耗及大量的排污使我国遭遇前所未有的资源能源危机、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有些环境污染问题甚至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需要被重视，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在施行了多年以后也越来越显现出极大的滞后性，无法起到真正保护环境的作用，于是亟待修订环境保护法的呼声愈来愈高涨。自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始就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提起议案要求修订环境保护法，据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统计，从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到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国人大代表有2353人次以及台湾代表团、海南代表团共提出修改环境保护法的议案79件。在这种种局势下，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于2011年下文，委托环境保护部起草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建议稿，后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综合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后于2012年8月下旬向全社会公布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并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经过一个月时间的征集，收集到了近12000条意见，其中有绝大部分对修正案（草案）表示了不满意，在这样几乎一边倒的民意之下，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同有关方面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又进行了部分修正后于2013年6月下旬再次向全社会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这次又回收到了2000多条意见，两次的公开征集意见的结果表露出公众对环境保护法的极大重视和期待。在这种局面下，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结合两次征集到的意见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并于2013年10月下旬向全社会公开并再次征集各方面的意见，随后作了最后的修订，于2014年4月25日正式公布，并规定新的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也在施行了25年之后，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可以说,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充满了曲折性,历经四次审议,从修正案(草案)到最后的出台用了近四年的时间,但这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广大民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对环境保护法改善目前的环境状况及正确调整环境保护和各方利益的期待。从环境保护法的整个修订过程来看,除了曲折性之外,也体现出了全民参与的广泛性、修法程序的开放性和内容的民主性。

新环境保护法亮点追踪

新环境保护法的特点综述

新环境保护法分七章,共70个条文,基本章节架构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大致相近,只是新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章节即“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相比较,新环境保护法除了只有极个别条款未作任何改动以外,其他条款全部作了大幅修改,总的修改特点是在强化政府责任的同时,更新了环境保护的原则和理念,更加深入了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更加关注环境污染的综合整治手段,同时也更关注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和打击。为配合这些特点,可以说新的环境保护法创设了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显现出其诸多特色,比如说,在新环境保护法的第一章总则中首次确立了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和公共参与原则两项新的原则。在之后的章节中,创设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如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制度,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实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等等。

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法律,做出的这些务实性甚至前瞻性的规定有标志性的意义,同时对日后单行法相关规定的制定及与之的衔接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新环境保护法的亮点追踪

新环境保护法出台之后,社会各界纷纷评价其亮点众多,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此,笔者挑选出新环境保护法中最主要也是最受关注的几大亮点进行逐一阐述。

一是强化政府责任,推行多元共治

强化政府责任、推行多元共治可以说是对1989年环境保护法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和突破,也是我国探索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一个开端。

强化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是这次新环境保护法修订的重头戏。新环境保护法试图改变目前存在的政府重经济责任、轻环境责任;重环境权力,轻环境义务的现状。转变政府职能,因而新环境保护法中关于政府责任的修改篇幅最大,涉及的条款也最多,甚至可以说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构成了整个新环境保护法得以实施的主

要基础。据统计,整部法律条文中涉及到“政府”字眼的条文近40条,涉及到环境保护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法律条文亦有多条,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基本和核心职责。除此之外,政府还承担着诸如: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投入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作,制定环境保护政策、规划和环境标准,分类处置和回收利用生活废弃物;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统筹城乡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应当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并接受其监督等等诸多法定职责。

在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上,完善监管体制、推行多元共治,整合全社会力量推动环境保护也是新环境保护法的又一大理念和亮点。新环境保护法一改旧法中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监管责任主体的做法,将对环境事务负有责任和义务的主体扩大到了近十类,除上文述及的政府外,还包括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有关部门、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其他组织、公民个人等,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充分明晰各责任主体在环境保护事务上的具体职责,从而以期从多层面、多方位利用社会合力全面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是加大了环境违法的处罚力度

长期以来环境法领域内由于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从而导致企业不守法的普遍现象,也正是由于部分企业不守法,才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峻。为改变这一现状,新环境保护法着力加重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和惩治力度,以期增加环境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从而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在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上,新环境保护法开创性地规定了对环境违法者的按日处罚制度。新环境保护法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可以按日连续处罚,地方性法规可以根据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增加第一款规定的按日连续处罚的违法行为的种类。此一按日处罚制度不仅是新环境保护法的一大亮点,也一直是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如果能真正实施到位确实能起到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极大震慑作用,但如何执行按日处罚制度还有赖于相关部门对该制度的立法完善。另外,相对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新环境保护法对相应的环境违法行为加重了处罚力度,例如,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标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由原来的“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修改为“责令其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对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旧法未作规定,新环境保护法规定“不得开工建

设”“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另外新环境保护法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强化了环境违法者的民事责任；新环境保护法还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四类环境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所以违反新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这些规定来看，无疑新环境保护法加大了环境违法的行政处罚力度，同时也完善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追究，环境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追究机制，这亦是新环境保护法对旧环境保护法的突破性修改和规定。

三是引入了公众参与制度及推动信息公开

虽然早在2006年和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当时还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就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推行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但几年来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对这两个制度的实施情况并不乐观，有很多环境法领域的案件都跟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不到位有关，如今新环境保护法将公众参与原则和信息公开制度提到法律的高度来规定说明了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环境管理公众监督权愈来愈重视。新环境保护法在其第五章设专章用六个条款专门规定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该章在首先确认公众在环境管理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基础上，随后又规定了应主动公开的政府环境信息及企业环境信息的类别，以及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的充分参与权及公众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监督权。

这一创造性的制度和规定旨在改变目前政府和公众之间环境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局面，提高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环境审批、监督和执法中的透明度，同时赋予公众在政府环境管理中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全社会参与和监管机制。

四是完善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自从2012年修订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作了“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原则性规定之后，对于与之直接相关的环境保护法该如何规定和细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而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进行衔接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关注环境保护的各有关组织的期待。尽管新环境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相关条款的规定颇为艰难曲折，但最终出台的新环境保护法明确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其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对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中对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有关组织新环境保护法将其细化为“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可以说新环境保护法的这一规定将起诉主体和可诉的侵害行为加以明确，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界的起诉主体规定不明确从而导致环境案件尤其是环境公益案件屡屡不被受理的现象，也让众多长期以来有志于环境保护的NGO组织看到了可以用诉讼手段来遏制污染、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曙光。

除了以上阐述的几大亮点之外，新环境保护法中还有诸多亮点，比如明确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以示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特别区域严格保护以维护生态安全；进一步明确环境监察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能以纠正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规定每年6月5日为环境日以提高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等等大家也十分关注的话题，在此不再一一叙述。

对新环境保护法改善环境的期待

近些年来，各种类型的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调查数据显示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的状况之糟糕均让人扼腕心痛。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几成了环境公害，且不说重污染天气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大面积爆发，严重地影响国人的生活乃至身心健康，让人谈霾色变。更有甚者，我国有不少地方由于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出现了癌症村。由此，我国环境污染的严峻态势可见一斑。在这一背景下，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可谓万众瞩目和万众期待，从上文可以看到，新环境保护法的很多规定也确实让人们看到了政府致力于保护环境的决心和态度，但针对我国目前严峻的环境污染现状、日益枯竭的资源和能源、有限的环境容量以及多年来的环境污染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新环境保护法的施行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环境保护有识之士的热切期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环境保护法这把利器已让我们看到了政府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决心。我们更希望新环境保护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能够真正实施到位；更希望通过新环境保护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能对目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起到应有的改善作用。十八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定义为“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热切期望这新十六字方针在环境法律领域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环节都能真正贯彻落实到位，也期待通过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山清水净、空气清新的美丽中国梦。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大有可为

文 深圳鹏正律师事务所 邓钧元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在中国的可行性研究将对我们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启示，我国应该大力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预付法律中介服务”，使法律真正进入百姓生活。

摘要：随着中国的法治发展，法律消费日益成为公民必不可少的生活成本。然而，由于法律服务体系的缺陷，律师与人们之间缺乏日常沟通平台，人们难以简单快捷地获得法律服务，往往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才被被动地寻求法律帮助，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法律服务的费用也大大提高。在西方法治国家，“预付法律中介服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它蕴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防患于未然”、“资源集中，风险平均”的理念，有助于公民便捷地得到律师帮助，得到广泛普及。笔者认为，“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在中国的可行性研究将对我们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启示，我国应该大力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预付法律中介服务”，使法律真正进入百姓生活。

关键词：法律中介服务 法律消费 司法公平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涵义与功能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涵义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是指人们预先支付一定的费用成为该服务计划的会员，然后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会员将及时得到计划提供者提供的律师帮助。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同于政府的法律援助，它的服务模式是，该公司向会员每年收取一定的费用，使其享受诸如电话咨询、律师函件、紧急事项处理等多种免费的法律服务，如果当事人陷入了诉讼纠纷，则根据协议提供优惠收费标准。同时，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很多的法律服务已经扩展到互联网上，会员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开展各方面的咨询。在海外，由于常年聘请私人律师成本高昂，很多家庭和中小型企业都选择了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公

司，因为这类公司的收费比聘请常年私人律师便宜得多。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通常由非律师经营，它的商业模式是，由专业的法律服务公司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在两者间构筑一个联系平台，由法律服务公司进行业务推广和吸纳会员，而签约律师只需保证向会员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该服务的盈利收入将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之所以有如此强的吸引力，得益于它先进的管理模式。一方面，会员可以直接通过拨打免费电话接入到公司，然后公司根据与各大律师事务所的合约，在约2500名精英律师网络中为会员安排专门性的律师。另一方面，公司通过高速数字网络构建实时监控系統，可以监督每一个律师的服务质量。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功能

风险分散

当事人参加“预付法律中介服务”投资较少，风险被均匀分布在众多会员身上。大多数家庭日常遇到的都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如房屋买卖，遗产分配，领养或离婚等，对于专业律师来说这些案件通常只需花几个小时，或者通过电话咨询就能轻易解决，费时费力的案件毕竟是少数。人们可以通过这一项服务计划平衡法律服务的费用与时间。

防患于未然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核心价值，在于避免会员遭受严重的法律问题，从而规避由此产生的经济打击。通过这一服务计划，律师可以及时地提供预防性法律服务，以免潜在的法律问题演化成费时费力的诉讼。因此，该服务的会员可以随时获得专业的律师意见，同时当事人也不会对将要发生的诉讼产生恐惧，因为会员可以享受打折的诉讼费用。

促使法律资源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中，商业性质的“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可以促使法律资源面向市场，法律服务公司在其中更好地扮演了律师中介的作用，一方面使公民接触到合适的专业的律师；另一方面保证了律师的业务来源，充分整合国家的司法资源和法律服务资源，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

美国“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发展历程

美国“预付法律中介服务”（PPL）由哈兰德·斯通西弗（Harlan Stonecipher）创办于1972年。对这个项目的开发起源于哈兰德遭受的一起交通事故。他在这一起没有过错责任的车祸中，不仅身受重伤，而且庞大法律费用几乎使他破产。他认为，公民权利的捍卫不应该是昂贵的，而应该是普及的。因此，他创建了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公司。很快，该公司便迎合了广大经济普通的家庭的需要，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最终在纽交所上市。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在国外市场需求状况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巨大成功，显示出市场对产品的巨大需求。50%的美国家庭每年至少遇到一次需要律师帮助的法律问题，然而90%的美国公民还不能做到聘请私人律师。美国是世界上诉讼最多的地方，人们去法院的机会是去医院的三倍以上。因此，已经有超过1900万的人口加入预付费法律中介服务计划，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而在欧洲发达国家，80%的人通过“预付费法律中介服务”拥有了自己的私人律师。这个数字在最近几年还在呈倍数增长。可见，在西方法制社会里，法律服务已经犹如健康保险一样成为了普通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它的存在确保了数以百万计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金融出版物说，对预付计划而言，现在的情形极像健康保险发展为万亿美元产业的前期。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在中国的需求与发展

笔者曾经调查过200个中国普通家庭，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200个家庭中有148个家庭十分希望得到律师日常的法律帮助。然而，在这些家庭中，47个家庭从来没有求助过律师，91个家庭只是免费咨询过律师，60个家庭聘请过律师为其解决法律问题，而只有2个家庭经常性地请律师。在从来没请过律师的138个家庭样本中，39个家庭认为法律问题能够自己解决，19个家庭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不需要聘请律师，而剩下的80个家庭则是认为聘请律师的费用过于昂贵，难以负担。从上面的数据可以分析得出，大多数中国家庭虽然很希望能够便捷地获得日常法律帮助，

但大部分家庭在遇到法律纠纷时不会主动请律师，因为他们大多数认为律师收费很贵。

随着法治理念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希望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特别是在消费、房产、婚姻家庭、劳动就业等方面更是需要专业律师的法律帮助。然而，国人相对薄弱的法律意识以及不健全的法律服务体系阻碍了中国法律事业的进程，占社会单元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家庭陷入了“零法律消费”的尴尬，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也不利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笔者认为，解决该问题最重要的是完善法律服务体系，普及“预付法律中介服务”。打个比方，有了医疗保险之后，我们在得小病时我们也会去看看医生，听听医生的建议，预防了大疾病的发生。我认为法律服务也应如此，只有经常地得到律师的建议，才能提高我国整体的法治水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医疗资源都已经市场化。可以说，市场化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源公平配置的必然要求。所以，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资源的公平使用，“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模式很可能是中国法治发展的一大趋势。

目前，国内拥有类似“预付法律中介服务”业务的公司才刚刚兴起，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但知名度较小。据笔者了解，北京的大华律盟、成都的大律企业，广东的众益律网等公司都是此类企业。但这些企业目前主要将服务推销给需要法律服务的中小型企业，而对普通家庭的业务推广还是相对较少的。不过，这些公司虽然是刚刚起步，但它们对“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本土化还是做出了许多努力。在价格方面，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即使是每年1000元的费用还是略显昂贵的，而这些公司推出的“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则制定了比较合理的价格，大约500-800元一年，能够让中国的普通家庭尝试接受这种法律服务。可以说目前国内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烈，惟有法律服务项目是一个冷门，没有竞争。我相信更多有眼光的人会发现这样一个项目，因为这是法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就像电脑，手机一样，以前老百姓都很陌生，现在不都接受了吗？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预付法律中介服务也会像数字化设备一样大众化。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在中国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法律中介服务市场的问题

在中国，最缺乏法律帮助的群体是一般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这个群体既不像社会上层群体那样能够轻松地进行法律服务投资，也不能像贫穷个体

那样得到社会主义法律援助的支持。同时,这个群体对于律师还存在很强的误解,认为律师服务属于高收费、高报酬。

一是对于一般收入家庭而言,日常的法律咨询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律师的专业意见,日常的普通纠纷往往容易演变成一起诉讼。法院受理的大部分案件就来源于这些家庭,例如欠款纠纷、房产纠纷,离婚诉讼等等。这类案件对于专业律师来说提供早期的法律防范其实非常简单,但问题是,第一我国普通家庭群体往往只知道灭火,不知道预防,在寻求法律服务时往往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第二,直接前往律所咨询的费用往往令人难以接受,普通律师一个小时的咨询费用就达到一百元到几百元不等。第三,律师往往通过熟人介绍,其专业方向并不能直观确定,加大了当事人对购买法律中介服务的疑虑。因此,在这几个因素的影响下,到律所进行日常咨询和预防咨询的当事人少之又少。

二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日常性法律服务则更是重要。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资金、人才、信息等方面面临重重困难,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中国的中小企业已超过5000万加,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8%,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较小,大多不会设置法务人员,而聘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费用又太高,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经常得不到预防性的法律帮助,造成进一步的法律纠纷。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了法律中介服务的必要性,然而具体到企业何时何处需要法律还是一片茫然。专业律师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完全没有显示出来,中小企业对于法律服务的投资远远低于正常水平。

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普及前景

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律服务资源并没有照顾到一般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到个人生活和企业的日常经营。而且,90%以上的法律服务资源都用在了诉讼,忽视了法律服务的预防性功能,这不能不说是法制社会的缺失。因此,中国需要一种先进的法律服务模式,即“预付法律中介服务”。

一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消费取向已逐渐从维持生存转移到以提高生活品质、改善生活环境上来。为了能给自己一个安全,舒适,稳定的生活环境,普通老百姓已经意识到法律保护的重要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法律保护体系似乎与人们的需求难以契合。因此,通过“预付法律中介服务”,我们可以合理地规划和调控资源,使普通民众以及中小型企业获得优惠又实在的法律服务,促进法治社会的发展。

二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法律服务的购买是最难选择的。当人们需要聘请律师,往往不能专业地确定哪个

律师适合自己,该律师是否有足够的专业水平处理案件,合理的律师收费应该是多少。而通过“预付法律中介服务”,人们不必再把时间精力花在考察律师上,因为预付法律服务公司能使律师的服务质量是相对得到更多的保护,公司通过定期的客户抽样调查,了解签约律师的服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基于“预付法律中介服务”的功能,人们可以便捷地得到预防性的法律帮助,既不必担心在咨询阶段支付昂贵的咨询费,也不用担心在诉讼阶段投入过多。

三是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当今中国的律师最担心的莫过于业务的开拓。通过“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律师的业务数量会迅速增长。律师可以得到了很多客户资源,有相对固定的月收入,同时不再为开拓业务而牵扯精力,不再为业绩压力承接自己不擅长的案件,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发挥专业水平,把服务质量做到最好。同时,“预付法律中介服务”也不会使律师失去积极性,因为律师能从非免费的服务项目中获得收益。

四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1986年至今,政府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全民普法活动,而每一年,国家政府都要下拨大量的专项资金开展法制宣传。对于社会而言,这样的措施并不能根本上提升全民的法律意识,也难以达到普法效果。如果通过“预付法中介服务”的模式,由政府来支持,由企业来搭建平台,采用一定的市场经济营销模式进行合理的资源调控,我相信法律理念一定能通过服务的普及使深深扎根,并最大限度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减少政府的社会压力,使政府的法律、法规有效实施。

五是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百年行业,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巨大,法治社会要求人们不断提高法律意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大又可为,使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从根本上为社会创造价值。

世界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至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作为法律人,我们任重而道远。笔者希望通过“预付法律中介服务”在中国的引进和推广,为法治中国提供帮助,为创造一个更公平公正的世界做出贡献。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更多开创性的方案,正如亚比拉罕林肯说过的一句话:“总之,我们要致力于让法律成为国家的政治信仰。”

参考文献

- [1] 哈兰德·c.史通斯弗尔.美国法律故事[M].海南出版社,2004.
- [2] 美国法律预付费服务走进中国[J].市民心声,2008.



实务经验

司法执行中迟延履行期间利息计算标准 四大转变分析

文 北京市君泰（深圳）律师事务所 江祚穆律师

最新司法解释对基于合同关系的债权人的延期履行期间的权益保护已经突破了2倍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限度，这一政策变化是随着利率市场化、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废除的进程而同步的。

基本情况

2014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8号，以下简称“8号司法解释”），该规定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3条、第29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法释〔2009〕6号，以下简称“6号司法解释”）相比，8号司法解释的颁行，进一步明确执行程序中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期间、基数、利率等重大问题，对保护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平衡债务人义务有重大意义。整体而言，8号司法解释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计算延期履行利息问题上的四大转变，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一个巨大利好。

延期履行利息计算方式转变：由浮动利率到半固定利率的转变

根据6号司法解释规定，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 ×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 2 × 迟延履行期间；根据8号司法解释规定，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一般利息 +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 迟延履行期间。简而言之，6号司法解释规定迟延履行期间

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倍计算，由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随着不同阶段的经济状况调整而变动，故6号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延期履行利率是浮动利率；8号司法解释规定延期履行利率分两部分，一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所依据的利率（这个利率是合同约定利率），二是固定利率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故8号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延期履行利率是半固定利率，一般债务利息可由当事人约定确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按照固定数额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确定。

8号司法解释对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仅仅是笼统规定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若继续追问生效的法律文书如何确定一般债务利息，则8号司法解释语焉不详。根据最高院执行局负责人的答记者问，权威观点认为是按照原来合同约定确定一般债务利息。

计息基数的转变：从单一计息基数到分类计息基数的转变

根据6号司法解释规定，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是计算利息基数。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借款合同债务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往往包括贷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往往包括赔偿金、抚恤金、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其计息基数就是法律文书确定的上述有关款项的总和。

根据8号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债务利息是计算基

数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最高院执行局负责人答记者问的精神，计息基数仅仅指本金，利息和诉讼费等其他费用等并包括在一般利息的计息基数中。关于加倍部分利息，明确规定其计算基数为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除一般债务之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由于该金钱债务包括了本金、利息和诉讼费等费用。实际上，延期履行利息两部分利息的计息基数并不相同。

期间计算标准的转变：从法律文书确定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一是迟延履行起算日转变：从法律文书确定履行期间届满次日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转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3条“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故6号司法解释迟延履行期间起算日从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次日开始计算。民诉法司法解释293条的规定在实践中会带来较多困惑，常见的情况为：某案一审判决表述为：“一、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本金X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如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两年后二审判决，判项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如何确定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的问题是一个很大问题。上述的两个判决仅仅在一审判决中确定了履行期间，根据逻辑关系，二审维持一审判决，二审判决生效且一审判决间接生效。只有一审判决规定了履行期间届满的问题，那么是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天起算迟延履行期间还是从二审判决生效开始计算迟延履行期呢？根据6号司法解释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93条规定，应该是一审判决生效后十天起算迟延履行期间。

根据8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一律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表述确定迟延履行期间起算日，如果没有明确表述的，就从生效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即上述例子中，从二审判决生效开始计算迟延履行期间。

二是迟延履行截止日转变：从法无规定到明确规定的转变

6号司法解释及民诉法的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截止日，民事诉讼法也没有。但是实际上强制执行中从法院扣划款项到债权人实际拿到款项，还是有一个时间差。除此之外，还存在判决分期付款

► 8号司法解释的颁行，进一步明确执行程序中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期间、基数、利率等重大问题，对保护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平衡债务人义务有重大意义。

导致分期迟延履行、案外第三人申请终止或暂缓执行等问题。由于法无规定，导致实际执行中的混乱。8号司法解释第三条对迟延履行的所有情形的截止日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克服了无法可依的混乱。具体规定如下“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每次履行完毕之日。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计算至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生效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其他方式变价的，计算至财产变价完成之日。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清偿顺序的转变：从并还判决数额及罚息到先给付判决数额后罚息

6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如果执行款不足以支付全部债务的，应当根据并还原则按比例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但当事人有约定的除外。整体而言，如果没有约定，对于债务及延期履行利息，6号司法解释主张按比例并还原则进行。

8号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再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8号司法解释主张是先还债务再还迟延履行期间利息，减少无力履行人的迟延利息负担，更进一步体现公平性。

存在问题

确定一般债务利息的方法不完全明确

究其本意，对于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最高院是本着两条线走路的原则制定8号司法解释，一是尊重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并以此确定一般债务利息；二是在当事人约定的基础上适当加罚，并以确定固定的利息。但实际上，一般债务利息的利率和计算基数问题，在整个8号司法解释语焉不详。最高院执行局负责人答记者问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释，认定一般债务利息就是合同等实体法律关系确定的利息。法院

本意是按照当事人合同约定确定一般债务利率和计算基数，但是当事人在合同中如果约定了正常利率和逾期（还款）利率，延期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率应该适用何者呢？根据延期履行的与违约的性质类似，应该适用逾期利率。总之，这个一般债务利息的确定是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结果。

没有明确法律文书的表述格式，导致实践障碍

由于8号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了迟延履行期间的起算日以法律文书生效为条件，充分考虑到目前二审判决中经常出现的“驳回起诉，维持原判。”的表达方式导致的法律效力传递作用（也即本文第一部分第（三）点的例子），从而导致有两个所谓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的问题。8号司法解释中应对法院此后的二审判决表述作出规范的表述格式，以防止出现这种逻辑上的纰漏。

对侵权责任、不当得利责任人等非合同债务人的惩罚过宽，不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等群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的权威解释，8号司法解释主要是有利于保护有合同基础的债权人，因为一般债务利息是通过合同等实体法律关系确定的，对于侵权行为、不当得利行为造成的损失，无法确定一般债务利息，故对非合同的债权人迟延履行，仅仅需要支付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息，每年的资金成本约在6%左右，对于被侵权人和原权利人的保护不力，也没用对侵权人或不当得利人形成履约压力。

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工作建议

8号司法解释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债权保护是一个重大利好，意味着迟延履行利率可以突破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目前仅为12%左右），对于金融机构债权催收以及合法权益维护都是有利的。为了帮助银行等债权人做好相应的工作，结合司法实践，提出工作建议如下：

一是建议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正常利率和逾期利率，并明确约定债务人违约、破产、清算等按逾期利率计算利息。

目前司法实践尚未完全放开保护4倍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之外的利息，所以迟延履行利率总计原则上不能

超过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银行贷款管理系统一般有自带的计息系统，如果约定正常利率或者逾期利率超过基准贷款利率3倍（固定利息约等于同期贷款利率），则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超过4倍部分可能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如果约定的正常利率或者逾期利率以3倍为限，则履行期满前的利率约定空间尚未用尽，对贷款人不利。为了平衡银行利息管理工作与现行的司法实践的矛盾，建议银行的计息系统采用分段计息的方法，在履行期满前后启用不同的计息公式，履行期满前按照合同约定的计息公式计息，履行期满后，如果一般债务利息的利率加上固定债务利率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采用4倍计算。另外，为了平衡贷款人利益和管理效率问题，建议约定的正常利率或逾期利率不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

二是建议做好起诉工作并加强与法院沟通，确保法院支持将逾期利率作为计算一般债务利息的利率。

一般债务利息是对迟延履行人的有力惩罚措施，只有在起诉或者申请仲裁程序中做好沟通，获得法官支持，将逾期利率（逾期利率一般高于正常利率）作为计算一般债务利息的利率，债权人才能最大限度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促使债务人尽快履行义务。

三是建议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迟延履行期间先还利息再还本金。

由于8号司法解释规定了先还本金再还迟延履行利息，对债权人保护减弱。当然，8号司法解释也赋予了当事人约定的权利。建议在借款合同中事先约定，如果因合同纠纷判决生效后，发生迟延履行情况并且债务人不能全部偿付款项，偿还顺序为先偿还利息再偿还本金。这个约定可以增加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否则等到法律文书生效后再要求债务人同意这一偿还顺序就很困难。

总之，8号司法解释对基于合同关系的债权人的迟延履行期间的权益保护已经突破了2倍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限度，这一政策变化是随着利率市场化、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废除的进程而同步的。一旦司法实践对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利息也实施保护，8号司法解释的能量将更多的释放出来，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一个巨大利好。



埋线减肥埋下祸害 依法诉讼讨回公道

文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骆元郡律师

[案情]

原告陈某看到被告某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在其店门口张贴的所谓“减肥终点站”广告后，花了3980元接受了所谓“埋线减肥”服务。前两次“埋线”并未见红肿，事隔1个月进行第三次“埋线”后，原告陈某身体出现异常，每日高烧不断，并且没几天全身脓肿出现了十几处，十分疼痛难忍。原告找到被告，希望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并要求解决目前的病情，被告迫于无奈就安排产品代表吴姓技师用针扎脓肿部位，再用拔火罐的方式试图将埋入的线吸出来。可惜的是，非但没有将脓液或线取出，反而导致脓肿处因挤压让脓液渗透到血液里，加剧了原告病情的恶化。事后，原告陈某不得不住院接受全面治疗。入院初期，原告只有17个大小不等的脓腔，后来慢慢发展到全身脓肿多达40几处，每日高烧不断。据医生讲，原告的症状属于典型的败血症（脓毒血症），需在脓肿处开刀将脓液引流排毒，若不及时处理，会引发白血病或其他血液性恶性疾病，危及生命。在住院期间，原告共接受多次手术，全身已有刀口36处，基本是体无完肤，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当时国内各大媒体知悉后进行了客观报道，特别是深圳市第一现场还专门作了5期专题节目。

原告陈某与被告未就赔偿事宜达成协议，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其医疗费用32211.82元，住院伙食补助3950元（住院79天×50元）、误工费31605.04元（住院79天×〔月平均工资8333.33元÷日工作天数20.83天〕）、交通费1292.6元、合计人民币69059.46元。因“埋线减肥”失败，在精神上给原告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因此原告还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同时，因被告提供的服务有欺诈行为，应当双倍返还“埋线减肥”服务费7796元（已交服务费3898元×2倍）。

法院受理原告的诉讼后依法作出了判决，除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部分得到支持以外，原告的其他诉求全部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本案焦点]

一是“埋线减肥”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被告超范围经营是否应受到行政处罚？

二是为原告实施“埋线减肥”手术的“技师和医生”是否涉嫌非法行医？

三是被告造成原告的伤害要不要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

四是被告提供服务是否属于欺诈，被告要不要双倍返还服务费？

[法律分析]

所谓“埋线减肥”是用注射器将所谓的“小肠线”注射入人体各处的穴位中，达到医疗美容瘦身的效果。这种埋线方法属于有创伤的操作，一些小医院和诊所达不到无菌操作的要求，更加不允许没有资质的机构从事这项医疗美容服务。结合本案提供如下几点意见：

一是被告没有医疗美容的资质，其实施“埋线减肥”的行为已超出了经营范围，造成了严重后果，应该受到行政处罚。

被告某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美容和化妆品的销售，并不含医疗美容。而原告接受的“埋线减肥疗法”是一种微创手术，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因被告无视法律，违规经营，并且给原告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严重的伤害，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深圳市南山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还对被告处以罚款4000元，没收违法所得3988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虽然罚款不多，但对被告实施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应有的惩罚。同时，也充分印证实施“埋线减肥疗法”的行为主体是被告，给原告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严重伤害的侵权主体也是被告。

二是为原告实施“埋线减肥”手术的所谓的“技师和医生”没有医师资格和相关医疗美容资质，也未依法在本市、本区注册登记，属于非法行医行为。

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必须同时具备3个基本条件：（一）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经执业医师注册



拍案说法

在商品交易文书上使用他人商标的定性

文 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 邓永律师

〔案情介绍〕

笔者代理的原告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维权案，公证书证实，2012年5月4日，原告代理人在被告邱某某经营的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民佳百货店购买了豆浆机一台，并取得收据一张，收据上写明商品名称为九阳豆浆机，价格208元，加盖“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民佳百货店”专用章。

对本案案情有如下两种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原告的“九阳”商标，构成侵害商标权，应当按照商标法第五十二条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应当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处理。

〔法律分析〕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的理由主要是：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商标法和本条例所称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均表明，商标侵权行为并不限定在假冒的注册商标必须跟商品或商品包装直接结合，只要当事人在商事活动中未经注册商标权人的许可，在经营相同或类似商品的过程中使用与他人相同或相似的注册商标，给他人商标和商品声誉造成损害，都应当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也就是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有关商标使用的规定出台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含义，已相应扩大了。其含义不局限于在商品本身或其包装上使用，而是指行为人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以体现商标最基本功能（商品来源识别功能）的直接、积极使用方式，使用在自己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本身或商品包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使用在有关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从而使自己的商品与合法使用相关注册商标的商品产生混淆。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曲解了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本意，显然不当。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明确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明确限定了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注册商标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无论是《商标法实施条例》还是两高的司法解释均是对“使用”作出解释，而非对“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作出解释，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没有对“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作扩大解释。“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仅限于在商品上、商品的包装和容器上使用，其含义不能扩大到在收据等商品交易文书上使用。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明确规定“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第七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包括将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企业名称、姓名用于商品、商品包装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使用”。结合本案例分析，“九阳”属于知名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在收据上使用“九阳豆浆机”作为商品名称，极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认和混淆，使消费者误认为该商品是原告生产销售的或者与原告有某种关联。被告因此获得利润，原告的品牌价值和商

业信誉、市场份额均因此受损，被告的行为显然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当然，律师承办此类案件需注意，原告需举证证明其字号属于“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并且被告在交易文书中使用原告的字号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误认和混淆。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按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理。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认定销售商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或者仅判令销售商停止侵权而无需赔偿损失，均不符合立法本意。前者理由为零售商与原告无竞争关系，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经营者。笔者不赞同此观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根据该立法解释，凡是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人均属于经营者。法院判决认为原告与被告无竞争关系，明显不当。既

然原告生产、销售豆浆机产品，被告销售同一种产品，二者就有竞争关系。在司法解释未对“竞争关系”作出明确指导意见的情况下，审判者不得臆断为品牌商厂和一般的零售商不具有竞争关系。不能把竞争关系限定为直接的竞争对手之间才有竞争关系。

法院判决仅承担停止销售而无需赔偿损失的理由在于：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难以区分其销售相关产品是否侵害了他人的企业名称权。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同样不妥。经营者作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既然从事营利性活动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其注意义务要高于相关公众和普通消费者的注意义务。尤其要求经营者对常见的知名品牌商品有较高的分辨能力。特别是本案被告销售的商品有注册商标，但被告收据上对商品名称不写对应品牌的商标而写九阳豆浆机，明显有误导消费者的主观过错。对此种行为，更应当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权利人的经济损失。

>>上接第35页

机关注册；（二）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历；（三）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并合格，或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1年以上。以上3条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然而，为原告实施“埋线减肥”手术的所谓的“技师和医生”未持有执业医师资格，未在被告所在地办理执业注册手续。这说明为原告实施“埋线减肥”的所谓的“技师和医生，不具备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必须具备的任何一个条件；同时，被告还不具备相应的硬件及消毒预防措施。这充分证明被告已严重违背了医疗操作规范和医护要求，存在有严重的医疗过错行为。原告有权对直接责任人和法定代表人提起刑事控告的权利。

三是原告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重创，所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应该得到法院支持，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原告是一个充满自信和爱美的女性，有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身段，加之又看到被告诱人的广告后，才到被告处作“埋线减肥”的。而被告实施的医疗美容过错行为，使原告遭受一场巨大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打击！在原告住院期间，每日换药长达2个小时，换药时钻心的剧痛让原告痛苦得死去活来。在两个多月得治疗期间，原告几乎天天以泪洗面，茶饭不思。由于在被告处感染控制得不好，切开排脓的伤口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愈合，而且其他多处感染的包块也不断向深部发展，至今还没有根除。因医疗过程极为痛苦

不堪，导致原告身体虚弱，精神更为衰弱。原告已先后接受了多次手术，全身已有刀口30多处，伤痕累累，基本是体无完肤；周边的人在同情原告的同时也把原告的隐私作为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国内各大媒体有的进行了客观报道，也有的进行了负面报道，使原告在公众中的形象严重受损，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因此，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并结合原告受到伤害的程度和负面影响，应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四是原告在接受医疗美容服务中，被告提供的美容产品和医疗美容服务存在有欺诈行为，依法应当双倍返还原告已付的“埋线减肥”服务费。

被告明明没有医疗美容资质和经营相关产品的资格，却用虚假的手段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消费者纷纷上当。原告在不知情且受到引诱的情况下，购买和使用被告劣质的产品并接受其违法的服务，不但没能减肥反而在心理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在肉体上遭受了极大的摧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因此，因被告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有欺诈行为，应当双倍返还“埋线减肥”服务费7796元（已交服务费3898元×2倍）。



案例解读

商标侵权案中承担责任的主体

文 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 杨宏海律师

〔基本案情〕

上海A画材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专业生产颜料等画材的公司，注册有A字商标、A图商标、A字+图商标；深圳B百货公司是一家百货连锁公司，在深圳各区均有连锁分店，其经营模式是以专柜租赁的方式由承租者实际经营，其收取租赁费及管理费。之后，A公司工作人员与公证员到B公司某专柜（专柜为邹某所租，与B公司签有租赁合同）购买了一批标有A图商标的颜料，经A公司技术部门鉴定该批颜料并非A公司所生产，A公司遂将B诉至法庭。

〔法律分析〕

本案中是否存在商标侵权行为？由于B公司和邹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使用图商标的行为是获得了许可的，而其销售的颜料并非A公司产品却使用了A公司的图商标，因此是典型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

本案中谁应该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赔偿责任？据了解，在之前起诉的多家百货公司里，均以百货公司败诉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赔偿责任而结案，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及理由大约有：公证书中明确写明了侵权商品是在百货公司内购买的；发票盖的是百货公司的章、电脑小票显示的是百货公司的店名、销售单上也有百货公司的简写等。所有这些证据均指明销售侵权商品的主体是百货公司，所以侵权行为人是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赔偿责任。

笔者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上述分析忽略了对专柜租赁人邹某与百货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分析，本案中实施商标侵权行为的主体是专柜租赁人邹某，而非百货公司，应由邹某承担损害赔偿赔偿责任。理由如下：如果百货公司与邹某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或是合伙关系、或是雇佣劳动关系，那么，根据侵权责任法及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那么由百货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赔偿责任毫无争议。但是本案中，百货公司与邹某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百货公司赚取的是租赁费及广告分摊的费用，而邹某才是真正的销售人员，涉案商品由邹某购买，再由邹某销售，利润由邹某获取，因此，销售侵权商

品的主体是专柜租赁人邹某。发票、销售单、电脑小票仅是用以证明谁是销售者这一事实的初步证据，而不是事实本身，结合租赁合同，足以认定销售者是邹某这一事实。从法律性质上来讲，百货公司开具发票、销售单、电脑小票不过是为邹某销售商品提供一些协助行为，百货公司决定不了该次交易中意思表示的内容。

是否任何情况下，百货公司均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前述分析，百货公司并非销售涉案商品的主体，而是协助者。但是，并非任何情况下百货公司均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百货公司明知道专柜卖的是侵权商品，仍然允许专柜租赁人销售，那么就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赔偿责任。

〔引申与总结〕

本案中，假设商标权人也起诉了该专柜的销售人员，那么该销售人员是否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赔偿责任呢？这也需要分析专柜租赁人与该销售人员的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是雇佣关系、劳动合同关系，则该销售人员不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赔偿责任，如果是合伙关系，则需要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赔偿责任。所以在诉讼中，基本法律关系的分析是关键。

本案还涉及到商标的间接侵权理论。对“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认定在商标法上基于不同的法理依据。传统商标法的基本立法目标在于确保商标的识别功能得以现实，即使消费者能够通过商标将商品与其提供者正确地联系在一起，以实现保护商品提供者凝集在商标中的商誉免受不公平利用和损害，以及保护消费者不受误导的双重目的。与此相反，构成“间接侵权”的行为本身并不在商标权人“商标专用权”和“禁止权”的控制范围内。法律将其界定为对商标权的侵犯是出于适当扩大商标权保护范围的政策考量以及该行为的可责备性，因此必须以行为人为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教唆、引诱或帮助行为为构成要件。本案中，百货公司只有在符合商标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赔偿责任。

【编者按】日前，深圳市律师协会公司解散与破产清算专业委员会主任卢林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破产法论坛。在会上，卢林与相关专家学者交流了关于率先在深圳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相关问题。在法学界争论已久的个人破产立法问题，再一次回归公众视野。就深圳制订出台个人破产条例的时机是否真的已经成熟就这个条例一旦出台，究竟会给市民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本刊对卢林律师进行了书面专访。

深圳律师助推个人破产条例率先试行

文 本刊编辑部

卢林从事律师工作已经有 27 年的时间，在破产清算和非破产清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现担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公司解散与破产清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在 2003 至 2005 年美国学习期间，他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个人破产法”有深入的研究。深圳市律师协会倡导深圳率先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他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认为，深圳具备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条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时机也相对成熟。

“现行的《破产法》没有关于个人破产的内容，这是一大缺憾。”卢林律师说，“市场经济充满着优胜劣汰，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天灾人祸、决策的失误、资金的断裂都可能致使个人处于一种无法正常生活的状态。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的保障，很难让债务人得到翻身的机会。”

《深圳律师》：日前，您应邀参加市人大“个人破产条例立法座谈会”，并提出在全国率先制定《个人破产条例》的构想，请问您是基于什么考虑？

卢林律师：第一，目前，企业破产为我国人民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理念上所接受。但是，个人破产制度在立法和应用上还不完善，这需要我们更新思想观念，尽快吸收国外立法及实践中的积极因素，尽早引入个人破产制度。第二，社会更加开放、个人自由度更大、私人财富也增多，若无与这些新现象相匹配的制度，特别是个人破产制度，则市场经济会成为无源之水，个人和社会的信用将很难确定。第三，深圳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制定个人破产条例的条件。至于为什么这么说，根据我们考察世界各地的个人破产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出，个人破产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绵延了数百年的时间，比如欧洲的意大利和

英国等国家从中世纪开始已经有了个人破产制度的萌芽，美国、日本等主流发达国家也早已经建立了完善、健全的个人破产制度，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建立了个人破产制度。所以在这个时候再来讨论个人破产制度需不需要建立以及它的必要性实在是显得多余。但是深圳目前是否具备了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条件和基础，是需要弄清楚的，因为它涉及到在深圳建立起个人破产制度能否被实际执行。对于这个方面，我认为深圳已经具备了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基础条件。一般来说，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需要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较为完备的社会征信系统以及在主观和技术层面上，还需要有独立的立法权限和较为完善的人才队伍，而上述要求，深圳在国内的城市当中都是居于前列，并且考虑到深圳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区域面积小，毗邻香港等特殊优势，能够使深圳在全国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率先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最优选择。

《深圳律师》：在深圳制定该条例的条件是否成熟，有什么优势？

卢林律师：首先，深圳作为我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就是深圳精神的最好的概括。深圳能够从一个边远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靠的正是这种深圳精神。这次深圳人大能够启动该条例的论证程序，委托三家机构启动条例的起草工作就是深圳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果在其他城市要启动这样一种全新制度的立法工作，可能无数的讨论和繁琐的手续就会耗费数年的时间，贻误了制定该条例的最佳时机。

然后，对于深圳制定该条例的条件方面：第一，深



在第六届中国破产法论坛上，卢林律师与相关专家学者交流了关于率先在深圳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相关问题

圳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毗邻香港。目前香港已经拥有较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深港两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间交流融合非常好，在深圳实行个人破产制度可以较为容易的从香港借鉴成熟、有效的经验。

第二，深圳人大拥有独立的立法权优势。在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制定《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在全国关于破产的地方性法规中走在前列，根据深圳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创设性的提出了许多改变当时计划经济色彩的规定，这些观点很多都在2006年制定的新《企业破产法》之中被吸收和采纳。

深圳中院拥有丰富的破产审判经验和优秀的破产管理人队伍。深圳中院在1993年也是在全国率先成立破产庭，并且在二十多年的审判当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制订了一系列规范和标准，审理的案件数量和大案要案的质量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并且，在深圳中院在册的还有31家管理人，清算人才总数超过300人，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同仁奋斗在破产业务的第一线上，例如深圳律协的公司解散与破产清算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会内聚集了深圳破产清算律师界的精英人才，并率先制定了律师从事破产工作的五个指引。

第三，深圳拥有全国较为健全的社保体系。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可以得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对个人破产有拦截的作用同时也为个人破产制度的顺利实施解除后顾之忧。深圳在社会保障指数、民生指数、就业与收入分配指数、人居环境指数、公共服务指数等每一分项中均排名全国前十。其中，社会保障指数排名全国第五、公共服务指数排名全国第一。并且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若干规定》，养老保险条例的修正案已提交市政府审议，同时还拟起草生育保险条例，该条例报请人大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另外，《深

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的修改也正在进行中。

第四，深圳在全国拥有较为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深圳早在2002年就开始实施《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这是全国第一部为个人信用征信奠定基础的地方性法规。目前，深圳市的个人征信系统的资料除了个人信用记录之外还包括了个人的社会公共信息记录。深圳市社保局、所有国内商业银行及其它合作单位均参与了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其中，商业银行每天将账户变动情况传输到个人征信数据库，保持相关数据的同步更新与储存；社保信息采取按需访问方式提取，即当查询者提出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时，征信系统自动通过网络向社保局提取相关资料，基本完成了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个人征信系统的互通连接。

第五，深圳的社会分配制度在全国也更为公平。2012年，深圳成立研究小组对分配制度改革做了探讨，从深圳实际出发，提出了分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提高工资，而是从全社会角度设立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今年可能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一般的有正当职业的人员，即使拿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再加上加班费等额外费用，一个月得到4000元人民币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是对深圳的社会中下层收入做出保障。而且深圳也在积极推进户籍改革，增加户籍人口的比例，让更多的深圳常住人口拥有深圳户籍，更好的享用深圳的公共服务；同时推进非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把非户籍人口纳入失业培训、救助和保险范围，并对非户籍劳务工子女在深圳享受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深圳律师》：深圳制定该条例，您认为主要有哪些难点或关键问题，应如何把握？

卢林律师：一是该条例调整的范围，包括该条例适用的地域的范围和人的范围。深圳毕竟不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其他城市之间没有单独、完整的边境管理制度。我们制定条例之后，对于谁能够被该条例所管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对具有深圳户籍的人还是在深圳有主要经济活动的人，怎样界定主要的经济活动，怎样防止其他地区的人恶意的通过该制度来申请个人破产等等都是需要在制定条例的时候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二是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怎么规定的问题。个人破产不同于企业破产，企业可以在破产之后注销企业，但是个人破产之后还要继续生存和发展。由于我国目前只有企业破产制度，在刑法中仅规定了妨害清算罪，该罪的适用主体也仅适用在企业 and 公司清算时，并不适用个人破产。但是，个人破产中，对于债

务人隐匿财产、妨害清算等行为却经常发生，西方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轻罪入刑”的概念，对于个人破产中出现的诸多债务人违法的问题能够有效的解决，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缺陷。

三是该条例与其他的法律怎么衔接的问题，关键也是法律责任。个人破产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它的顺利执行需要许多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制度的衔接，例如财产登记制度、个人信用制度等。在个人破产条例制定之后，相应的制度有可能也会要进行相应的修改，由于个人破产关系的面太广，个人破产条例不可能囊括所有的方面，所以社会各种法律、法规或者制度都需要将个人破产的法律责任予以囊括，形成完整的一个法律体系。

《深圳律师》：提出该条例，您之前做了哪些探索？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如何克服的？

卢林律师：2003年到2005年期间，我在美国留学的时期就学习、研究了美国个人破产法，在美国以及回国之后都零星的进行了一些研究。从去年开始，我逐渐的转为系统性的对个人破产制度进行学习和研究。除了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破产制度之外，我还到香港破产管理署实地进行学习参观和研讨，与香港个人破产产业的同行业建立了长效的沟通机制。在探索个人破产制度的过程中，说不可能，办不到的人也大有人在。例如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目前不像美国一样存在反欺诈法，也没有西方式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等等。但是，我始终认为事物总是要往前发展的，而且法律往往是有严重的滞后性的，我国现在也在不断的发展。虽然我国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较之以前已经有长足的进步了。深圳走在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前列，春江水暖鸭先知。而且，欧洲国家很多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建立了个人破产制度，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已经建立了个人破产制度，台湾和香港也已经实施多年。深圳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相关制度我认为不可能差于几十年前的其他国家。

《深圳律师》：您曾说：“如果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同意深圳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深圳律师协会愿意承担起立法的起草工作。”能否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有哪些初步构想，准备从哪几个方面起草该条例？

卢林律师：事实上，我们目前已经初步起草出了一部草案。这部草案目前我们还在不断的修改、完善的过程中。我们深圳律协也对此召开了多次的研讨会，召集行业内的精英律师进行起草。我们的草案目前主要是分

为个人清算和个人重生以及法律责任等几个大的方面。个人重生制度只要是债务人和债权人双方对于债权债务的一个自愿安排，给予债务人较为充分的自由，鼓励其进行重生。个人清算制度针对债务人负债情况比较严重，或者是重生之后不能达成预定的目标的债务人，个人清算之后，债务人的大部分财产会用来偿债，而且会被法院宣告破产，对于个人的信用会留下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债务人也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失权期，在这个期间内债务人的许多正常的生活权利会被限制。如果债务人在清算或者重生期间有违反规定的行为，我们也会对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规定。

《深圳律师》：如果该条例能够顺利实施，会对个人产生什么影响？

卢林律师：个人破产制度能够真正的做到宽容失败、鼓励重生。如果建立了个人破产制度，债务人不必要因为背负债务整天东躲西藏，最后弄得家破人亡。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或者个体企业的出局前和出局后场面险象环生，赖账、逃债、三角债乃至以刑事暴力手段实现债权的情形比比皆是。个人破产制度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比较良好的方式。另外，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当中，许多人都因为突如其来的灾祸而倾家荡产，在金融危机中，许多人都都亏得血本无归，如果没有个人破产制度，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希望，个人甚至家庭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因此，从个人方面看，个人破产制度是对债务人一种很好的解救方式。对于债权人而言，现在很多债权人在执行的时候都是轮候查封债务人财产，然后等待漫长的执行。执行基本上就是先到先得的原则，手慢的债权人基本上什么都得不到。而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之后，这种情况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个人破产制度能够保障同等类型的债权人平等受偿，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

后记：在深圳率先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满足深圳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也是加快深港两地融合与发展的需要，更是适应全球经济大环境的需要，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同时深圳特殊的地理优势、人才队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也为深圳率先建立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日前，深圳市律师协会已向市人大提交了“关于在深圳率先制定《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立法建议函”，受到了市人大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反馈。目前，公司解散与破产清算法律专业委员会正在准备《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律师协会建议稿。

【编者按】深圳律师业“创一流”有奖征文活动，吸引了执业律师、实习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的积极参与，共征集到50余篇文章，内容涵盖了执业精神和理念、律师队伍建设以及对律师业未来发展的宏观和微观思考等方面。上期杂志，本刊刊登了“深圳律师业‘创一流’”主题征文评选活动中荣获二等奖作品，本期杂志继续刊登部分三等奖作品。

在社区里奏响法律人生的交响曲 ——8年“法律进社区”打造品牌社区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文 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曾常青律师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对推广“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高度重视。胡春华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把这项工作作为依法治省、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抓手，实现政府基本法律服务在全省村（居）的全覆盖。省委副书记马兴瑞强调，当前存在基层群众对法律服务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与法律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等矛盾，加强基层法律服务势在必行。深圳市先行先试，在2006年就启动了“法律进社区”活动。作为深圳市第一批“法律进社区”的律师之一，我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挂点社区历经8年。8年里，我同宝城律师事务所同事与光明办事处共同开创性地在社区创办了“法律进社区工作站”、“公益法律超市”等，打造出品牌社区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在依法治国和深圳创建一流法治城市的大环境下夯实了基层法治基础。

光明模式工作站

深圳市“法律进社区”工作伊始，我们就创建了社区法律服务的品牌——“光明模式工作站”，受到了从社区居民到时任市委书记的高度认可。

2006年6月，在深圳市司法局的统一部署下，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被分配到深圳市委书记挂点的偏远地区——原宝安区光明街道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如何才能“进得去，留得住，干得好”？如何让法律进入寻常百姓家？宝城律师事务所在原属深圳市宝安区的光明街道（现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设立了全市首家常驻社区法律公益机构——“宝城律师法律进社区工作站”。我作为骨干力量之一负责工作站的具体工作。

律师固定值班与纠纷调处相结合是“光明模式工作站”的核心内容。2006年开始，我坚持每周二、四、六

到社区值班。开车往返在宝安和光明的路上，光一个来回就需要两个多小时。在社区，我主动将光明司法所作为社区挂点律师专门印制的名片（印有公益法律服务承诺）派发到居民的手中，有时候还上门提供法律咨询，一来二去，和很多社区居民的朋友，而我的电话则成了老百姓的“法律热线”，遇到突发事件，还需要积极参与调解。

2010年3月，在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圳美社区，以归国侨民为主组成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深圳市江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民，因受到无关人员的鼓动，认为公司不承认其股民身份，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进而引发了群体性上访，社会影响很大。我和同事李维双律师在接到光明办事处司法所的通知后，立即组成法律服务小组，分别与公司管理层、上访股民进行了沟通与协调。作为客观的第三方，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参与了二十多次专题会议，劝导公司管理层公布财务状况，并对江翔公司的公司章程提出了合理的修改建议，拟写了监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设立合理的监管制度，从根本上杜绝了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从而缓和了这场股民上访风波。

公益法律超市

2012年3月29日，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工作，宝城律师所与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共创社区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公益法律超市”正式在光明办事处白花社区挂牌。在这里，可以提供包括咨询、宣传、调解在内的一站式服务。在更大的范围内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参与社会管理，推动社区管理创新。

“公益法律超市”内设有调解室、咨询台、图书阅览区、视频设备、法律查询系统等项目。现场值班是“超市”

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主要方式之一，值班人员由我所两名值班律师和光明办事处司法所调解员组成。同时“超市”设立“法律超市咨询专线”和“法律超市专用QQ”，并以在宣传栏公布和印制宣传册的方式“广而告之”。

让法律成为社区居民最大的“靠山”

让更多的人懂法、守法，帮助普通百姓建立法律信仰是我多年“法律进社区”工作的追求。身为基层老百姓，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由于不懂法，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显得极为朴素。记得在2007年底，光明农场50多岁的黄老伯找到我诉苦，他承包的土地面临被征收，因为没有关系，没有“靠山”，失地的他打算暴力抗拆，向我咨询会不会坐牢。我了解情况后，将法律法规与拆迁补偿政策相结合进行分析，一方面引导黄老伯要依法维权；一方面联系辖区拆迁部门，主张黄老伯合法合规的补偿诉求。仅两天，拆迁部门和黄老伯达成共识，双方都对我表示感谢。黄老伯专门追到龙大高速光明出入口处守住我，要送给我他家养的鸡和种的韭菜，认为我不是亲友胜似亲友，以后，我就是他的靠山。我笑着说：“我不是你的靠山，法律才是你的靠山！”几番婉拒后，我收下了韭菜，因为这是黄老伯对我在社区开展法律服务工作的肯定。

8年来，我参与法律咨询活动118场，参与信访接待15场，参加电台、电视台法制栏目点评11次，接待咨询群众1520人次。开展法制讲座7场，培训人员5200人次，培训人员涵盖社区居委会主任、社区居民、治安联防队员、信访员、人民调解员、企业员工等各个层面，多次参与了重大社会矛盾处理和群众纠纷调解。

参与“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工作感悟

康德有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在社区公益法律服务平台，我感受到法律人梦想的温度。弘扬法治，或许更应走进寻常百姓家；共筑梦想，或许就是帮助最基层的群众建立法律信仰。付出时间、

精力，甚至牺牲了一些业务拓展机会，但我实现了法律人的社会价值。

省委书记胡春华针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批示：“切实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防止走形式”。如何才能避免“走形式”？结合多年经验，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个方面：建立常态化的前沿阵地；保持良好的心态；树立社区律师公信力。

第一，建立常态化的前沿阵地，不能搞“一阵风”的形式主义。“法律进社区”活动应摒弃任何的形式主义，单纯地摆摊发放普法宣传资料，“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其实际收效之甚微亦显而易见。一个稳固的前沿阵地对于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意义非凡，值班律师可以此作为依托，深入社区广泛开展各类法律援助活动。

第二，律师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需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自愿投身社区公益事业，乐于承担社会责任。忌自认为别人有求于己便自傲忘形，未耐心倾听完，就按己之思维惯性，亦未加以严谨的法理分析，便“信口开河”。社区居民或社区管理机构有“难”，当他们心怀希望前来，若因未收取律师费而随意应付，不认真细致地答疑解惑，则只会自毁信誉，反添社区居民或社区管理机构对“法律进社区”活动的不信任、不配合，导致“法律进社区”活动自导自演，流于形式。

第三，律师在“法律进社区”活动中需保持中立和诚信，虽与政府部门和社区管理机构密切配合，共同化解社区纠纷，但不能抛弃自身的中立身份，“偏袒”管理方，以“帮凶”的负面形象示人。要为社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要在社区居民中树立律师的职业公信力。

法律进社区，就是改变居民维权意识，改变社区管理者的管理意识，让他们学会依法维权，依法管理，采用更理性、更有预见性的方式来化解纠纷。社区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最基本的构成元素。依法治国，社区是基础，创建一流法治城市，需要社区挂点律师带动基层百姓共同来维护法律秩序，让社区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法律规则中更加幸福平安。



斋墨心语

“创一流”让深圳律师走得更远

文 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陈伟律师

所谓一流，根据百度释义的解释，是指形容事物的等级和类别，有一类，一个流派，第一等之意。就深圳律师行业的“创一流”而言，我理解为，深圳律师应当具备并一流的专业水准，一流的服务理念，一流的职业操守和执业精神等，并通过律师职业群体持续的提升和服务，来充分提升律师的地位和形象、展现律师的价值、实现律师的历史使命。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横空出世，一个年轻的职业群体——深圳律师，也隆重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向世界展示了她的风姿和丰采：全国第一家全国律师事务所、全国第一家涉外律师事务所、全国第一家自负盈亏的律师事务所、全国第一家个人律师事务所……这些举不胜举的无数个“全国第一”，让全国律师无不惊慕深圳律师的创新与辉煌！深圳律师的身影活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从传统的诉讼业务，再到新型的非诉讼业务，从国内法律服务到国际法律服务，深圳律师显然已经成为了全国律师行业的“灯塔”，让仍然在茫茫大海中缓慢航行的全国各地其他律师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要实现“创一流”的目标，深圳律师应当坚持法律信仰，坚守法治精神。律师作为西方文明的舶来品，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讲，是一个新兴的职业。中国受官本位以及重刑轻民等传统司法思想的影响，以及老百姓对律师职业的错误定位与认识，让律师职业备受诟病和争论，甚至在部分律师的心目中，仍对律师的职业定位及价值有着偏颇的认识。全国律师包括深圳律师，应当对我国的法治环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曾将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贴在办公室墙上：“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法律就是国王在一个专制的国家，国王就是法律。”一个香港老板看到后，带着意味深长地语气问我：“请问，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这就涉到了法律信仰的问题，我思考了一下，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民主的国家！”这个香港老板若有所思，点头示意。

要实现“创一流”的目标，深圳律师应当实现法律

服务的标准化。深圳律师的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绝对不是仅靠一个或者数个大律师的努力就能完成，她需要深圳全体律师的共同努力和贡献。不同的律师，可能有不同的服务方式或者执业技巧，这使律师服务存在差异化。如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当事人就会有一千个律师评价。要提高深圳律师的整体服务水平和专业技能，以及社会美誉度和认可感，深圳律师应当实现法律服务的标准化。比如在律师办理民事离婚案件中，作为原告方的代理律师，如何与当事人办理委托代理手续，如何进行诉讼风险提示，如何调查取证，如何进行举证，如何在参加庭审活动等，以及作为被告方的代理律师，如何进行答辩，如何指导当事人提供证据等等，实际上是可以实现标准化服务的。虽然离婚案情可能千差万别，但是上述程序和注意事项却是必不可少的。要提高深圳律师的整体办案水平，使深圳律师更好地实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责，我们可通过集思广义的方式，发挥群体律师的智慧，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服务指引，使深圳律师成为一流的专业律师。

要实现“创一流”的目标，深圳律师应当具备高超的专业水平。在老百姓心目中，律师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被公认为是社会精英，这与律师的专业水平是分不开的。深圳律师应当通过不间接地学习，掌握最新的法律法规，了解并能熟练运用现行法律法规，来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创一流”的目标，不仅要求我们掌握基本的法律法规，还要求我们学有专攻，在各个业务领域方面能呈现越来越多的专家型的律师，如刑事辩护律师、婚姻法专家律师、金融证券专家律师、劳动法专家律师等。一个称职的律师，应当是熟练掌握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而一个优秀的律师，是应当是全面掌握法律知识同时在某一法律领域有着深入研究和丰富执业经验的专家。

通过“创一流”活动的开展，深圳律师必将再次成为全国律师行业的航母，引领全国律师实现中国律师的法治梦想。我们深信，“创一流”，将会让深圳律师走得更远！

【数字】

11.27万件

2014年前9月，全国行政执法部门共查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11.27万件，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938个。当前侵权假冒行为呈现三大新特点。一是侵权假冒商品违法活动由多人或多个团伙配合实施，形成了原材料提供、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链条，组织分工严密；二是由实体市场向互联网领域转移，网络成为重灾区；三是逐渐向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集中，监管难度加大。

2000万元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从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进一步加大对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法律规定，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按照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四类事故等级分别处以最低二十万元最高两千万元的罚款。3500多个

目前，全国四级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机构已从2011年的600多个发展到3500多个，占检察院总数的97%，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自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部署建立案件管理机构以来，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机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案管制度体系基本形成，队伍建设成效显著，有效发挥了职能作用，检察业务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全国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共有工作人员1.5万余名。

【关键词】

国内首部大学条例

我国第一部专项高校立法——《深圳大学条例》目前已完成起草工作，并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旨在通过立法和法治手段，加大对深圳大学的支持力度，加快探索和提升我国高校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电子脚镣”

近日，在上海市南汇监狱内设的法庭上，随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合议庭法官宣读完对罪犯陈勇予以假释的刑事裁定书，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即上前在陈勇的脚腕部佩戴上内含GPS芯片和SIM卡的“电子脚镣”，这意味着陈勇在裁定书载明的接下来6个月中，将通过这一电子设备接受无间断的实时监管。这也是全国法院首次出现通过法律文书对假释对象实施电子实时定位监管予以明确。

“起诉登记”

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共收到行政起诉591件，其中561件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被书面裁定不予受理，占到了全部起诉案件总数的96%。但是，如此之高的不予受理立案比例，不仅没有引发当事人不满，反而赢得了不予受理裁定上诉率稳步下降，行政烂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的良好效果。对此，三中法院副院长何通胜说，这还要归功于该院今年开始试行的以“起诉登记”和“审前程序性审查”为主的立案试点改革。

【声音】

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既是人民制宪的过程，也是一次规范的民主与宪法教育的实践，立宪中所体现的民主精神确立了新中国宪政的民主基础，其中实行的领导机关意见与人民群众讨论相结合的原则与方法对新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八二宪法的修改过程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宪法的民主精神，扩大了民众参与修宪的方式和范围，使现行宪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紧迫的，谁反应得快，谁应用得好，谁就受益；谁重视不够，谁就会落伍。今后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充满变数，有远见的律师事务所不会坐以待毙，将会积极应对。

——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盛雷鸣

现在“医闹”已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使医疗工作无法进行，甚至危害医生生命和患者抢救工作，这些也属于犯罪，应该入刑。

——全国政协委员姒健敏

【业界前沿】

司法部发通知：做好为农民工讨薪维权服务工作

司法部近日印发《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农民工讨薪、维权等服务工作的通知》，就加强司法行政系统做好为农民工讨薪、维权等服务工作作出部署。通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精神，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在做好农民工讨薪、维权等服务工作、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中的职能作用，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山东：律师政法机关挂实职探路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2014年10月10日，山东省司法厅选派12名律师到政法机关和国有企业挂职锻炼。据介绍，2013年4月，山东省司法厅选派5名党员律师到高唐县政府和政法机关挂职锻炼一年。10月挂职的律师属于第二批，全省各地律师均可自愿报名，要求报名者业务水平高、综合素质硬，执业五年以上无不良执业记录。在促进互相尊重的同时，律师作为职业挑错者，他们的挂职也有助于提高办案质量。

上海自贸区：试点中外律师事务所“互派”和“联营”

上海市司法局2014年12月9日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外律师事务所互派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实施办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的实施办法》，这标志着自贸试验区法律服务扩大开放措施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两个实施办法，一是将已经对港澳地区律师事务所实行多年的派驻法律顾问和联营的措施，扩大到外国律师事务所；二是将港澳律师可以受聘为内地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的“单派”，扩大为中外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互派”。

广东：成立中立法律服务社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由广东省法学会牵头发起组建的“广东中立法律服务社”，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服务社将发挥法学法律工作者的优势，为公众提供第三方专业化和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据广东省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法律服务社的宗旨是弘扬法治、公正惠民、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

深圳：检察改革启动：建立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

深圳市区两级检察院的检察改革正式启动。根据改革方案，检察人员将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检察官实行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在拓宽上升通道的同时，获得相应职业保障。同时，全市检察官将实行员额制控制，进入检察官序列的“门槛”相应升高。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从事法律工作5—7年，经检察官任免委员会的选拔，才有望成为检察官。

《2014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发布

法制日报社和中国政法大学企业法务管理研究中心今天在京联合发布《2014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测评发现，和2012年相比，2013年行业法律风险状况变化不大，金融保险业法律风险指数最高；其次是纺织服装皮毛制造业。而信息技术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的法律风险指数最低。测评还发现，国有法人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本年度首次高于非国有类公司。1523家非国有法人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指数均值为25.236，比国企26.329低1.09%。

全国首家司法指导中心落户北京：免费指导打官司

全国首家司法指导中心在西城法院正式揭牌。2014年12月4日起，凡是到北京西城法院准备打官司的群众，都可以到西城法院的司法指导中心享受帮助。指导中心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等多家有影响力的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对接，只要是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都可以直接来到司法指导中心寻求法律援助，法院会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帮助其联系专业的调解组织或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中国法院地图上线 可查阅3496个法院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与百度公司共同开发的“百度·中国法院地图”正式上线。“百度·中国法院地图”共收录3496个法院，除军事法院外其他类型法院均已收录其中。只要点击地图中的相应法院，就可浏览该法院词条中包括地址、邮编、电话、法院简介、机构设置、官方网站、百度地图在内的多类司法便民信息。

1

粤港澳法律服务开放政策研讨会暨粤港澳律师合作发展研讨会召开



2014年11月13日至14日，由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律师协会主办，深圳市司法局、深圳市律师协会协办的粤港澳法律服务开放政策研讨会暨粤港澳律师合作发展研讨会在深圳召开。广州南沙管委会、深圳前海管理局、珠海横琴新区管委会、省港澳事务办、省司法厅、省商务厅、省经信委、国家外汇局广东分局、香港律政司、香港律师会、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等单位 and 香港、澳门、广东律师代表共150余人参加会议。中国（香港）法律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春，省司法厅副厅长梁震，省律师协会会长欧永良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解读了《内地律师事务所向香港律师事务所驻粤代表机构派驻内地律师担任内地法律顾问实施办法》和《香港和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广东省实行合伙联营试行办法》两项新政策；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三地领导就三地法律服务开放合作建设情况以及优惠措施进行了介绍；粤港澳三地律师代表就合伙联营、三地律所应对律师行业国际化挑战以及搭建三地律师业务协助平台作了主题发言。

杜春总经理表示，中国（香港）法律服务公司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帮助广东与香港、澳门律师界开展交流与合作，望各相关部门在税收优惠、资金补助、业务扶持、人才培养和通关便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合伙联营师事务所快速发展营造良好条件。

梁震副厅长指出，合伙联营政策是应香港律师界的诉求，探索完善内地与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作模式的开放新思路，望更多的内地、香港和澳门律师事务所参与合伙联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

2

市律协、深圳图书馆“公益法律服务平台”成立一周年

2014年12月6日下午，市律协、深圳图书馆联合举行“公益法律服务平台”成立一周年庆祝活动。市律协副会长胡宁可、深圳图书馆副馆长王冰出席，并为获得“优秀律师志愿者”的十名律师授予荣誉证书。

“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创立一年以来，“深圳图书馆律师志愿团”志愿律师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法律咨询和律师讲堂形式，共举办法律咨询活动46场，普法讲座12场，受到广大市民欢迎和一致好评。该项目已被评为“2014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者服务示范项目”。

市律协和深圳图书馆均表示，今后要充分发扬各自优势，进一步加强合作，努力探索建立常态化、长效的公益法律服务机制，推动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进程。

3

我会与前海管理局就深化合作达成五项共识

2014年11月20日上午，韩俊副会长、前海发展战略委曾迈主任、赖轶峰副主任等一行9人拜访前海管理局，并与前海管理局经营发展处沈华新处长、宋亮主任、曹正清处长助理就双方合作以及建立日常工作联络协调机制等内容进行了交流。

会议围绕双方合作达成如下共识：一是深圳市律师协会、前海管理局将联合组建前海政策法规宣讲团，为进驻前海的企业及拟进驻前海的企业宣讲相关政策法规；二是在前海管理局现有的金融政策法规汇编基础上，按照前海产业“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体例分类汇编前海政策法规，统一中英文版本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让更多境内外投资者和企业了解、运用前海政策法规；三是支持深圳市律师协会在前海设立前海法律研究中心；四是双方将进行律师的生存状态及全国各地的律师扶持政策调研，积极研究前海律师发展扶持政策；五是建立双方日常工作联络协调机制，推进前海经济及深圳律师业的发展。

4

我会受市中院委托对法院执行工作进行评估

2014年12月2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通报了中院拟定的《关于率先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标准（试行）》（下称《实施标准》），并正式向我会递交了对《实施标准》落实情况及法院执行工作进行评估的委托函。高树会长和张斌副会长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就第三方对法院执行工作进行评估的问题答记者问。

为了客观评判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情况，我会正式受市中院的委托，承担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实施标准》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的

重任，目前已完成《第三方对深圳各级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评估办法》的草拟工作，并着手组建独立第三方法院执行工作评估团。高树会长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深圳率先建立由律师协会主导的第三方对法院工作评价制度，标志着深圳法律人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法治建设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精神，表明深圳法律人在新时期就建设深圳一流法治城市方面达成战略共识。它是建设性的，而非负面的；是具有专业性并日趋客观公正，而非随意牵强的；是具有社会公益性的，而非带有任何行业利益关系的。接下来，我们将认真做好评估团成立和成员选任、评价制度和评估机制建立以及沟通互动等各项基础性工作，切实把法院执行评估工作落到实处。

5

市律协举行新执业律师宣誓仪式及宪法宣传活动迎接首个国家宪法日

2014年12月4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市律协组织部分新执业律师宣誓入职，并联合广东省律协举办国家宪法日知识竞赛暨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市律协张斌、黄思周、韩俊副会长等出席活动。

100余名新执业律师身着律师袍，佩戴徽章，在黄思周副会长的带领下庄严宣誓，表达了深圳广大律师忠于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建设法治中国的崇高信仰和坚强决心。张斌副会长寄语新入职律师：一是要践行律师使命，怀揣律师职业荣誉

感；二是要勤勉敬业，诚信执业；三是要信仰法治，坚守公平正义。希望各位律师恪守社会公平正义，多为立法建言献策，为深圳建设一流法治城市和法治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由广东省律协公益法律委员会及市律协公益委员会、宣传与公共关系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宪法日知识竞赛暨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在莲花山公园风筝广场拉开帷幕。活动共派出省、市律协公益委和市律协宣传委多名律师解答市民疑问，并制作200多道以《宪法》、《律师法》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知识题目，现场发放宪法单行本。市民通过学法、思考、答题，达到了宣传宪法，普及法律知识的社会效果，纷纷对寓教于乐的活动形式表示赞赏。

6

加强国际间行业交流推进国际化发展进程

2014年12月9日，市律协与新加坡律师公会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暨中新律师研讨会在市律协举行。新加坡律师公会会长骆维明、会员交流部部长Shawn Toh，市律协会长高树、福田区司法局副局长马小戈、环太平洋律师协会（IPBA）前副秘书长法国律师Come IDRAC，市律协监事长魏汉蛟、副会长黄思周、韩俊，以及我市律师代表共70余人出席。

高树会长表示，新加坡是以法治引领民主闻名全球的国家，其法律体系严密、执法严格，法律人信仰高尚，国民守法，这些值得借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市“三化一平台”战略部署的背景下，市律协一直以港澳台为出发地，积极推动深圳律师业国际化的

发展，本次是继与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律师会签署合作协议后，市律协再次与国际律师同行签署并建立行业战略合作关系。

骆维明会长认为，当前中新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是中新两国法律界加强交流合作的最佳时机。新加坡是践行法治和倡导民主的国家，其行业管理体系专业完备，政府更是大力培育和开发国际化法律服务市场，这都促使了新加坡律师公会致力加强与国际律师同行的交流与合作。骆维明会长欢迎高树会长及深圳的律师同行到新加坡进行访问交流，并诚挚希望双方按照签署的合作协议，认真务实地推动中新律师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中新双方合作协议的签署，为中新律师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为深圳律师与新加坡律师之间进行深入交流、开展广泛务实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水·谣

文 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 李继志

云

将倒影倚在静静流淌的水里
听榕树苍老的呼吸
它知道那是梦
隔着天与地的距离

水

将雾气升腾幽幽飘零的云端
听空谷千年的回音
它知道那是梦
隔着实与虚的空寂

谣

将歌声化入涓涓流淌的岁月
听水车默默的轮回
谁知道谁的梦
隔着生与死的回忆



